

五

刺刀下的奴隶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无辜被抓“思想犯”身系囹圄近七年

钟如森初稿 邵文津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为维护其野蛮的侵略统治，制造各种罪名，疯狂地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

1936年，农历八月二十日晚，突然有伪警察和日本宪兵两人，闯入我家，不容分说，将我逮捕到日本宪兵队。当晚桓仁镇内男、女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北关小学的一部分教员，也都被抓进监牢。第二天，沙尖子、桦尖子、拐磨子等学校的校长，也相继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关押起来。

我被捕的第二天受审，逼我承认参加了救国会和缴纳过会费。我矢口否认，凶残的日寇，竟肆毒手，棒打鞭抽，悬梁、灌凉水，拳打脚踢等酷刑轮番进行。每日每夜，宪兵队院内，身遭毒刑的人们，呼天号地，遍体鳞伤。昼难饮食，夜难成寐，惨不堪言。

在同年农历八月一日，宪兵队先将地方各界人士，如农会孙余三、吴庆海。商会钟德滋（我父亲），教养工厂刘怡亭、金聚廷，城关村长盖洪洲，协荣汽车经理刘子藩，县政府内务局长邱春伯，会计股长杨海清，收发股长周发庆，警务股长于济洲，司法股长杨国祺，特务陈云秀、王增智及第一批被捕的男师范校长李景南，女师范校长宋禹言，职业中学校长吕敬五，北关小学校长关麟书等，在宪兵队长杉本德五郎命令下，由宪兵和翻译进行审讯，在严刑拷打与逼供下，有人挺刑不过，信口

胡说，承认入了救国会。还有的承认拿过会费等等供词，遂株连各校教员和地方人士。因此，抓来第二批思想犯，日日审讯，邱春伯、孙余三、王在经、金聚廷四人，因刑重死在宪兵队。其余六十几名，在农历十月中旬，由宪兵队协同守备队押送南扎木车站，由沈阳宪兵队接收到沈阳陆军监狱、警察厅、教育厅三处羁押，后由军法处长王冠英和日本杜边两次会审，强制裁判对孟继武、李景南、宋禹言、吕敬五、关麟书、王居九、李剑秋、刘子藩、关云斋、王增智等10人处以极刑。判无期徒刑的5人，判15年徒刑的12人，13年4个月徒刑的22人，12年徒刑的4人，10年徒刑的3人，宣布释放8人，判后收监管押。当时，我年方30岁，系身囹圄，铁窗冰室，身遭摧残，每日两餐，饭稀不见米粒。当时狱内传有“束米煮成两碗粥，鼻风吹得浪悠悠，碗中好似团团镜，苦命之人在里头”的歌谣。

同年农历十一月下旬又转押抚顺监狱。这个监狱是新建的，室内寒气逼人，鬓结冰霜，囚服御寒难，彻夜难眠，挣扎在死亡线上。在1937年春，我病魔缠身，既无人护理，又不予治疗，奉苍天保佑，得以更生。

我的刑期13年4个月，后经3次减刑，在康德10年5月12日期满释放。但是，虽然脱出牢狱，身份上还是被监察管制的要人，外出请假，来客报告，还是动者得咎。我想，若没有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没有“九三”的胜利，恐怕难活到今天。

（摘自《桓仁文史资料》）

我全家在伪满抓“思想犯”中的遭遇

王书钟

1936年，我们全家是10口人，有两位老人，公公和婆婆，兄弟3人，妯娌3人，二位大伯哥他们没有孩子，只我有两个孩子，大伯哥陈鹏飞当年40岁，是老中华民国公安分局长，日本侵占东北的时候，愤然辞职，在家呆着，二大伯子陈鹏乙是小商人，我男人陈玉峰当年27岁，是桓仁县东关学校的外语教员。我那年22岁，是桓仁县立北关小学教员。全家老幼，正在安分守己过日子的時候，不知何故，大祸临头。

1936年阴历八月初一晚11时左右，全家人早都睡着了，忽然大門被撞开，好几个日本兵和伪警察，手持刀枪，一拥而进，闯进屋来，这些人用枪对着我们大喊“不许动”，叫我们全家都坐在一起，将大伯子陈鹏飞捆绑起来，翻箱倒柜，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孩子被吓得直哆嗦，老人苦苦哀求，也不顶用，最后还是把大伯子带走了。第二天，我到学校听人说，在昨天晚上半夜时，桓仁县的各学校的校长以及有点名声的人（有抗日思想的人）都被抓到宪兵队去了。家里被抓走了人，也不知是犯了什么法。从这天起，公公婆婆及大伯嫂一连几天吃不下饭。又过了20天，也就是阴历八月二十半夜，又来了几个日本鬼子，将我男人陈玉峰也抓走了，哥仨抓去了两个。几天以后，有两个日本宪兵到北关小学去找我，他俩不怀好意，一见到我就动手动脚的，叫我跟他俩到宪兵队去看看那些“罪人”。我说：你们干什么，我要临产了。鬼子大笑起来，改口说：“我们是吓

唬吓唬你，我们是来拿花盆的，快快全拿来。”

我的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二的女孩。从八月初一那天晚上开始，我5岁的大孩被吓得没处躲没处藏的，一听说有动静，起来就跑。听说鬼子要斩草除根，我大孩子晚上不敢在家里住，在我姐姐家磨底下蹲着，盖上破麻袋，等到下半夜才敢上炕睡觉。农历八月三十日，我又生了个男孩，对别人不敢说是男孩，也不敢给孩子起个真名字，家里人就叫他饼子。

哥俩被抓到宪兵队以后，受尽了酷刑，灌凉水，灌辣椒面子，吊起来打，用马拖，叫狗咬，叫你死不了活受罪。大伯哥一看，这个罪实在遭受不起了，就把被抓时手上带的金镏子吞了下去。但被鬼子知道了，又给打下来了，不但没死了，还白白地遭了一回罪。在阴历十月份的一天晚上，日本宪兵将所有被抓去的人，一串串地绑起来，横七竖八地装上了卡车，上边用苫布盖着，很多日本人拿着枪在身上踩着，天亮时被拉到沈阳，等候判刑。被抓去的人当中有的判了死刑，被枪杀了，并让我男人在刑场陪决。我大伯哥判了11年，我男人判了15年，都被押在抚顺监狱。

从他哥俩抓走后，70多岁的老公公整天忧愁上了火，几个月时间两眼全瞎了，并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于1937年3月3日死去了。1937年5月，大伯嫂子去抚顺监狱看望他们哥俩，见面后，哥俩都不愿意让嫂子马上回来，希望她在那里多住几个月，好月月见一次面。因为长时间住抚顺，花销太大，嫂子只好给人家做饭洗衣服，干些杂活，挣个吃饭钱住宿钱。八月初有一天我嫂子去监狱看望他哥俩，有个姓刘的看守说，你能拿出500元钱来，我保证让你男人出狱，他还说他和狱长是弟兄。嫂子没文化，也不加分析，就往家里写了航空信，让家里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给寄去500元。家里只好把三间房卖了一间半，

把钱给寄去。8月13日嫂子收到了钱，就把钱交给姓刘的看守，一心等着男人出狱。等到第二天，嫂子去监狱打听情况，别人却告诉她说，那个姓刘的拿钱跑了，嫂子一股急火窜上头顶，得了脑溢血，不会说话，不懂人事，于8月15日晚上死去了。等到天冷地上冻的时候，才把嫂子的灵柩拉回来。从这以后，婆婆就更加伤心，更加仇恨，常常半夜起来对天叩头，叫日本鬼子快死光，好让儿子早回来，她饿不知吃，冷不知穿，好像得了精神病似的，过了不久，婆婆开始便血，血中带有烂肉，于1938年正月十四日也死去了。算起来整整17个月的时间，抓走2人，死了3口，我家在伪满抓“思想犯”中被害得家破人亡。

（宋玉峰整理，摘自《桓仁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寇在承德制造的“国事犯”事件

高滋安口述 彭明生整理

无辜造罪

我叫高滋安，今年（1984年）80岁，家住下二道河子村。康德5年，日本在承德制造一起株连300余人，波及热河省，轰动伪满洲国的国事犯“救国勇士团”假案，给我定的“救国勇士团”团长罪名，冤狱4年多，判处死刑，我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气恨难消。

我20岁中学毕业后，靠父亲高占元（他是老中华民国热河省唯一的参议员）的关系，在汤玉麟的热河省财政厅当科员，25岁调承德县当财政局长，一直干到民国22年（1933年）3月4日

日本侵占承德。日本进承德后我加入协和会当会长，康德5年（1938年）6月辞去协和会会长当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于11月中旬我去新京（长春）经济部办理统一配给面粉手续，回来下火车，在承德车站被两个日本特务抓捕。他们两个押着我用马车拉到承德警察厅（康德6年后改为承德警察署），搜我身，然后把我关在警察厅留置场（就是拘留所，现在西大街小榛子沟口橡胶厂办公楼后院处，容纳100人）。承德警察厅警务科（康德6年后改为警务系）科长迟松岩雄（日本人）在留置场问我：“有个叫苏士纲的你认识不？”我说不认识。他说你不说实话该受罪了。半夜承德警察厅司法科长松田（日本人）把我带到审讯室，也问我认识苏士纲不？我说不认识。他命令手下人把我捆在板凳上，手和脚拴在凳子腿上，捆得结结实实，一顿狠打，边打边问。我不说，灌一大壶凉水，又打。实在受不住，我只好承认说认识苏士纲，这才把我解开送回留置场。又过十几天，警务科长迟松岩雄又提审，问我年龄多大，我说34岁。问我干啥的，我说是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他又问：你为啥做出反满抗日的事？我说没有。他命令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一顿毒打。有一个日本人叫水野的打人特别狠，把我打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憋死，朝我脸上泼些冷水，我才慢慢缓过气来。迟松岩雄又继续问，我仍然说没有。他让人把我衣服扒光，用烧红的火钩子烙我。一边烙一边问。我不说，他们就烙个不停，连打带烙，浑身没好地方，剜心地疼。我实在受不了，就说：你们问啥我说啥。翻译孙阳生按着迟松岩雄的旨意一边问一边写。问我认识苏士纲、张实（又叫张自凡）、黄德太、苏华等二十多人不？我怕再用刑，不管认识不认识，就说全认识。孙阳生用日语说给迟松岩雄，迟松岩雄点点头，又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成立反满抗日组织，多少人参加，叫啥名，在哪跟八路军见的面，在

哪开的会，谁是主持人。我都不知道。又打又烙。我受不住，就对孙阳生说：“孙翻译官，你们知道啥告诉我，我全承认。”孙阳生说，你们成立的救国勇士团，皇军全掌握，你说实话吧。我就按着迟松岩雄的引供全承认了。我说，孙阳生记，最后我签名按上指纹，才把我拖回留置场。

事后，我才知道抓我的原因。“七·七”事变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全民起来抗日，日本在满洲国境内到处抓反满抗日的国事犯。我在新京时，就看到东北各报纸刊登的“沈阳事件”中遭杀害的反满抗日人员的照片和消息，其中判死刑者6男1女。日本驻承德“清水部队”的消息传到外边，说承德街有通八路的间谍，热河省总务厅长远藤（日本人）命令承德警察厅搜捕国事犯。厅长陈景起、副厅长迟雄（日本人）、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按着清水部队和总务厅长的要求，开始在承德抓人。特务科的特务文履谦（日籍朝鲜人，外号文高丽）是副厅长迟雄的心腹，他伙同本科的特务陈书阁、王作孚在承德街到处侦探通八路的人。当时西村名次郎和陕西营街长苏华（阴阳仙）关系甚密。苏华想要大佟沟陈二老爷的女儿做妾，陈二老爷不干，把女儿嫁给热河省税务监督署雇员苏士纲的弟弟苏士英为妻。苏华对苏士纲和陈二老爷两家产生仇恨，要伺机报复。苏士纲的外甥黄德太从北京来承探亲，苏华乘机向西村名次郎报告，说苏士纲家从国外（指长城里）来了八路探子。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奉副厅长迟雄的命令带特务文履谦、陈书阁、王作孚将黄德太抓到警察厅进行严刑审讯。黄德太只认识他外祖父苏勤茂、舅舅苏士昌、苏士荣，苏士纲、苏士英，别人不认识。特务文履谦按着副厅长迟雄的指令事先设计一个反满抗日组织表，一边用刑一边引供。黄德太受刑不过，只得按引供的线索招认。特务将苏勤茂父子5人抓捕，同样严刑审讯，受刑不过，也招认了

引供材料，这就是日本制造的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假案的起因。

残酷毒刑

特务把黄德太抓到警察厅后，硬说他是八路探子，他根本不是，更没有反满抗日活动，特务提出的事，他一概不招认。然后特务给他用酷刑，先是用皮鞭子蘸凉水抽，不招认，灌火油、辣椒水，用杠子压肚子，还不招认，就用烧红的火钩烫脸，烫身上。黄德太受刑不过，就按特务引供的事全招认了，并在供词上按了指纹。承德警察厅把黄德太的供词上报热河省总务厅和驻承日本关东军。在热河省总务厅厅长远藤指令下，成立一个特别搜查班，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母雄任班长，办公地点在宪兵队（现在市公安局院里二层旧楼），特别搜查班员由承德警察厅抽3人，负责承德街，由童瑞九当翻译，承德县警察局（承德6年后改为警务科）抽3人，管承德县范围；日本和伪满宪兵队各3人，管满洲军队；日本领事馆3人，管日籍公职人员和侨民。用日产黑色车牌100号的轿车做刑车，在特别搜查班班长板田母雄的领导下，于昭和13年11月17日为期开始了大搜捕国事犯。边抓人边严刑审讯，不断扩大线索。凡是被抓的国事犯都施严刑拷问，由于受刑不过，都将自己认识的人咬出来。承德街开始抓人时，我正在新京出差，别人把我咬出来，回来在火车站（18日）被抓。承德“四才子”王逸如、张庸安、韩允修、孟仲芹被抓捕。当时抓了300余人，赤峰100名，建平70多名，承德130多名，下板城30多名，滦平30多名，隆化20多名。最大的70多岁是原姜桂题部退役中将曲中义（别名曲海臣）家住二道街子，在家闲呆，也被抓捕受酷刑；最小的15岁是一个在上板城街头讨饭的男孩，也当八路探子抓捕受刑。当

时日本鬼子抓人简直红了眼，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一律抓。被抓的人先是关在承德警察厅留置场，那里只装百十来人，后来容不下，全关进承德监狱，重点人砸上手铐、脚铐子。监狱外面用草袋子装上砂子堆成掩体，由日本宪兵架上机枪日夜站岗。抓捕结束，热河省警务厅、承德县警察局、承德警察厅、锦州高等检查厅、承德分厅、承德区检查厅、承德地方检查厅和锦州高等法院承德分院、承德区法院、承德地方法院等联合在南营子三官庙院内，将东西配房各隔断7间，在配房南端又盖两间，一共16个房间做为临时留置场。把被审讯的人，从监狱用汽车拉到三官庙圈在新隔断的临时监号内。当时给我定的罪名是“救国勇士团”团长，给苏士纲定为副团长。救国勇士团是承德警察厅日本人给起的名字。把我和苏士纲关在南面的两间监号内，每人一间。当时集中了伪满全国高等检查官和高等法官二三十人，设立好几个刑讯室。一开始就是刑讯我和苏士纲。因为我们这些被抓的300余人纯属假案，根本没有这个组织，全是屈打成招。从监号把我押到审讯室，打开手铐和脚镣，我心想，高等检查官可能说理，下决心在公堂翻供。审讯室，除了翻译官和书记官全是日本人。审讯开始，检查官问我几个事，我全说不知道，检查官生气地问，供词不是你招认的吗？我说全是受刑不过胡说的。检查官骂道：“狡猾狡猾的”。又上来四五个日本警官，将我按倒在地一阵毒打，我还是不招认。接着，将我十个手指用竹签子夹住两个人拽，同时用烧红的火钩子烫身上，一边夹一边烫一边问，我受刑不过，只得将原来引供的供词又全招认了。从那以后，再没有审讯我。我一直不服，可也没有办法。把我审讯完，就审苏士纲，让我出庭陪审做证。苏士纲不承认，先给他灌火油掺辣椒水，然后用烧红的火钩子烫，把他打折好几根肋条，最后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审讯完我们两

个后，开始审讯别人，都让我们俩出庭陪审作证，不作证就施酷刑折磨。凡是受审讯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刑的，个个被折磨得胡说八道，打得体无完肤。当审讯到伪满热河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科长张实（30来岁）时，他很有中国人的骨气。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供职，对离宫外八庙的文物尽职尽责，设法保护。能耐不小，爱国心强，平时在省公署就看不起日本人，表现很傲慢。所以抓国事犯时，说他是救国勇士团的秘书，把他抓起来用刑。他对汉奸特别仇恨，他看到翻译孙阳生、特务王作孚、陈书阁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卑膝的丑态就骂，特务对他更加残酷折磨，灌凉水，跪刺木头，滚雪地，压杠子，坐老虎凳，上电刑，手心钉钉子，火钩烫，灌火油掺辣椒水，割肉撒盐面，竹签子夹手指，由于受刑不过，最后他按着检查官的引供招认了。他日语讲得很好，完全用日语回答检查官的问话。检查官问他你都发展谁加入救国勇士团，他为了除奸，当堂把翻译孙阳生、特务陈书阁、王作孚、日籍文履谦和在实业厅的日本人咬出好几个。检查官当即下令就把在公堂的孙阳生抓起来，随后把张实咬出的几个人全都抓了起来。就这样，起初为制造“救国勇士团”假案卖命的苏华、孙阳生、王作孚、陈书阁、文履谦和几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人全成了囚犯。原先他们给别人用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自己也全受用了，被打得体无完肤，成了重铐重镣在身的囚犯。在审讯苏勤茂、宏达堂掌柜孙洞臣、还有傅南云、滦平商工公会会长高农山时，在堂上被活活打死了。当审讯文履谦时，让我、苏士纲、张实出庭陪审作证，张实端起放在地上烧火钩子的炭火盆朝检查官砸去，把几个检查官砸伤烧伤了。张实又遭一顿酷刑折磨，拖回监号，他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在监号上吊死了。日本在三官庙审讯时，全在夜间。从监狱往出提人，由

留置场往监狱送人，也在夜间，日本法西斯的毒刑惨无人道。我们这些无辜人在毒刑折磨下，做了无罪囚犯。

花钱买命

经过几次过筛子刑讯，陆续放出不少人，到康德6年初，还剩108人，有人称一百单八将，关在监狱内。根据“罪行”轻重，分别戴上不同的刑具。这些人，全是承德街和各县有名望的人物，酷刑下招供，刑后翻供，对刑讯不服，弄得检查厅很头疼。我们在承德监狱关押半年多，又陆续释放了一部分。最后剩下72名（有人称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于康德6年（1939年）6月押转到锦州监狱。我们离开承德那天情景最惨，阴阴的天，早晨掉几个雨点，吃完早饭，看守叫放茅（上厕所），不大会儿放茅时间到，又赶紧回监号。有的进监号还没坐稳，看守又叫到院里集合。顿时，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把我们包围起来，端着刺刀，个个如狼似虎嗷嗷乱叫，把我们这些囚犯两人一个手铐一对一对铐起来，又4人一根绳，一串一串地捆起来。大家都以为是要进行集体屠杀。然后由警察拖上汽车，一共几辆汽车我说不清，不叫随便看。汽车上的宪兵架着机枪，上车后，都让低着头坐在车箱里。汽车开出监狱门，我从车箱板空隙看到，路两旁站着很多人，有的放声大哭，尽管警察宪兵像疯狗似地狂吠乱驱赶人群，人群就像潮水般地随着汽车流动，哭声越来越大，逐渐连成片。我们这些车上的“囚犯”都预感到这是送葬的队伍。汽车开出监狱大门一直向东走。汽车开到二道街子附近，车上有几个“囚犯”也放声哭起来。当时我也以为是集体屠杀，心中觉得特别冤枉特别凄惨。有的家属在街上叫着名字哭，囚犯没有不落泪的。那种悲惨景况真像杜甫《兵车行》诗中写的那样：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汽车直向河神庙杀人场（今市教育局后勤那地方，原先有个河神庙，是民国时期的杀人场）开去，有的人就想跳车。当汽车开到小南门回民杨家院门口时又朝南拐下去，顺武列路直奔火车站。这时，我的心才掉了肚，路旁几乎没人了，汽车也开得快了。到了火车站，又是一片人群。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人群隔在场外，囚车一直开到站台上。警察和日本兵在四周站岗，高处支着机枪，把我们推下车面向北山低头坐著，不许左顾右盼。只听站外一片哭喊着，非常揪心，面临生离死别，真是“……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无论是站外的家属，还是站台上的囚犯，皆知此一分，是今生难会面的诀别。我们在车站呆一个多时辰，然后坐票车拉走。夜间到了锦州监狱，砸上脚镣入监房，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康德7年初，锦州高等法院依据检查厅在承德刑讯形成的起诉材料开庭进行一审，将我和苏士纲判死刑，其他人分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法庭一审没有用刑，绝大多数人都不服判，我当庭就申明不服判决要向最高法院上诉。判后，把我和苏士纲砸上重铐重镣关进死囚牢，等待新京训示。监狱看守把犯人当成摇钱树，对囚犯敲骨吸髓。本来监狱生活特别苦，早晨一碗粥，中午一碗饭，晚上一碗粥，有时给一碗菜汤，有时啥菜也没有。犯人有病不给治，医官下监巡诊，也是一看了事。就这样，看守还经常打骂虐待。师范音乐教员倪治仁、陈永孝、苏士昌、苏华、张贵山、白子厚、孟彦博和殊像寺喇嘛络凤桐等人均被看守打死。不想受罪的人就得给家人写信要钱，家中把钱寄到会计科，个人说明理由，领出一点，暗中送给看守，才能免灾。在锦州监狱3年多时间，我零星送给看守几百元。我的

上诉状呈上之后，锦州高等法院通知可以聘请律师。当时无论法官和检查官全是日本人充任，聘请律师也必须是日本的，我花两万块满洲票，聘请一个原在日本高等法院当院长后因年老当律师的名叫上山的法学家。他看了我的上诉状，又到监狱听了我的陈述，他对案中定我带领队伍在滦平县某地进行操练的时间和我去日本观光的时间（1937年3月，锦州铁路局组织的锦热两省半费旅日观光团）有出入产生了质疑。上山律师根据我提供的出国证据，他又回国进行了调查。先后经过一年多时间，将我出国护照、照片、指纹等文字证据拿到锦州高等法院。康德9年8月立秋前夕，经新京最高法院院长批准，最高法院在锦州高等法院组织合议庭，进行二审判决，上山律师在法庭与法官展开了争辩，当庭出示了证据，证明案中定我带队在滦平进行操练是假的，否决了我当“救国勇士团团团长”的认定罪。团长没有人，救国勇士团组织也就不存在了。最高法院日本人审判长元林通过翻译说：“你们这些人虽然少有犯罪证据，但是对满洲帝国心怀不满，可是经长期（4年）教育，脑筋总是有改变的，国家对你们特别宽大，今天放你们回家，要做忠于帝国的顺民……”就这样，日本法官羞羞答答地当庭宣布无罪释放我们这些坐了4年冤狱的“囚犯”。有37人先后在刑讯室和狱中被折磨死，有不少人被蹂躏成为终身残废。

我所见到的日寇罪行

刘长民

日寇侵占我国东北时，我14岁，我家住在绥化县四方台镇。

伪满14年四方台镇有一个叫福田的鬼子官，只带领几个日本兵，就统治了整个四方台镇管辖的范围，掌握着各方面的大权，为所欲为。他们随便抓人，罪名不是什么政治犯、国事犯，就是经济犯，简直没有中国人的活路。记得有一次他们把一名无辜的人抓去，竟无中生有地说是思想坏了，说和抗联有联系，于是用麻袋把人装上摔得死去活来。他们还用皮鞭抽、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中国人，受害者九死一生，而侥幸活下来的也是伤痕累累，肢伤体残。

日伪统治者随便抓劳工，被抓的都是穷苦大众，有钱人可以花钱雇。康德9年（1942年）的春天，我亲眼看到被抓的劳工约有100人，从四方台乘火车，去黑河服苦役，听幸存者说，劳工有了病，就带着气埋掉，在日本人眼里死个中国人比死个小鸡还容易。

日本侵略者对有抗日思想的人，迫害得更为厉害。我表兄武秉权和我侄女的公爹盖洪福，都住在张维镇东姜家屯。伪康德5年（1938年）的冬天，他们用大车给抗联孙国洞的部队送粮食、油、盐被鬼子和汉奸发现而抓去，关押在哈尔滨监狱。盖洪福被残害死在狱中。武秉权关押多年，直到光复才出狱。武盖两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伪满期间，鬼子把盖家屯划为“红军匪区”，盖家屯人员外出必须到伪警所挂条。来客须及时报告，不报者以“坏人”论处，全屯的百姓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凡与抗联有来往的，都要抓去蹲监狱，家属和亲友也要受牵连。记得，伪满康德5年（1938年）冬天的一天，我四姑父（武秉权的父亲）到我家来串门，被一特务发现了，报告给了日本宪兵队，特务说我父亲刘志杰和武秉权是亲属，也一定和抗联有联系。宪兵队特务郑某，带着几个鬼子到我家来搜查，柴禾垛、土豆窖、仓房内外翻个遍，硬说我家藏了抗联，足足翻了一天，没

有查出任何证据。但他们还不罢休，又把我父亲带到绥化日本宪兵队，审讯逼供，并动用各种刑罚，他挺刑拒不承认，日本鬼子没办法，让找出保人，方可放回。当时，全家都为我父亲的生命担心。后来，由四方台商务会串联各商号做的连环保，才把我父亲放了出来。回家后，也没有人身自由，特务监视得更紧，不准外出串门，隔三天两头找到伪警察署特务股训话，不准乱说乱动。同时，由汉奸伪屯长马春芳直接监视。特别是到年关看管得更严了，家里老少提心吊胆，无一日安宁。

日寇实行“粮谷出荷”，警察、汉奸到处横行，伪满康德10年（1943年）冬天，“粮谷出荷”很紧，警察、汉奸挨家挨户地翻粮，柴草堆、箱子柜子、仓房翻个到，有粮不交者，就定罪名，说什么“反满抗日”。四方台警察署杨警尉，外号叫“杨大棒子”，带人去农村催粮，把穷人家翻个底朝上，什么也没翻着。他穷凶极恶地把全屯人集合在一个院子里，然后他用大棒子挨个打，直打得哭声震天，跪地求饶。寒冬腊月不准戴帽子，有的耳朵都冻坏了，杨大棒子还让人把各家的烟囱堵上、灶门封上，不准生火做饭，一直到交出粮食为止。当时，我家有一点儿粮食，怕鬼子翻出来，大祸临头。就偷偷地把粮食藏在烧火的炕洞里，或睡觉的枕头里。“粮谷出荷”时，我在海伦读书，学生的生活特别艰苦，吃粮尤为紧张。记得，我们住宿生有60余人，每天吃的都是土豆粥。用一口漏粉的大锅，添上一锅水，用些冻土豆子，放点小米，咕嘟一大锅稀粥。每人每顿喝两碗，肚子饿得非常难受，学生无心读书，只能在苦海中虚度时光，盼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早日来临。

（刘芥山整理，摘自《绥化文史资料》）

在满铁做事的遭遇片断

葛荣山

“九·一八”事变的当时，我在吉林铁路局沈吉线北山车站任站务员，担当旅客运输工作。至1934年被调转工作到滨吉线磐石车站任副站长，担当行车、配车等运转工作。当时满铁遵循日本侵略政策，和满铁管辖铁路计划，首先由日本内地陆续调入大批日本人，担当铁路上的要职。磐石站有站长北村舍治郎以下7个日本人，他们为了施行“帝制路政”，监视中国人的动态，合谋对中国人施行了百般的凌辱和压迫。

1935年8月的一天，我在磐石车站运转室值班时，突然，日本站长北村舍治郎推门而入，他说：“副站长，你办理行车懂得运转规章吗？你拿来运转规章我看一看。”我当时把运转办理细则交给他，他翻了一会又问：“你说咱们车站应当常备多少‘响礮’？”我回答说：“应当常备3具6个。”他立即就怒目视我，破口大骂：“混蛋！”又用日中协和语调说：“你顶好看看没有啊？这上8个以上的字，随便说话，欺骗站长，满洲国人‘王八’一样哟！”还余怒不消地坐下吸烟。我想，这些东西是连转主要备品，并且车站也是这样常备的，不会记错。我又向站长说：“站长说的是‘止轮器’不是‘响礮’你可以拿出规章，咱们再一对，证实是谁的错。”他不得已，把规章交给我，我就把“响礮”和“止轮器”这两条规章找出来给他看，这时他才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勉强地借口说：“我老啦（当时年纪不满50岁），眼睛不好使，你们满洲人叫日本人骂没啥，站长骂你还不行吗？”

他抬腿就走，我只有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伪满时期，为了管制铁路员工食粮，他们在较大的城镇或车站，设有生计事务所，实行通帐制度。每人按定量配给食粮，全是高粱米、苞米和橡子面。在1935年旧历春节前配给中国人少量大米、白面。由于担任配给磐石车站员工食粮的生计所设在梅河口，每人自己去领，影响工作，就派人到生计所集体去领，回到车站再行分劈。不料在分劈这些食粮时，梅河口铁路监理所监理员日本人佐部（担当巡回监理车站工作的）乘501次旅客列车来到车站，他下车后看到员工拿着口袋分米、面，就不满意地问我：“他们在干什么呢？”我说：“由生计所集体领来的食粮，现在分劈呢。”他没好气地骂着说：“你们满洲国人，狗一样，给点好吃的，教你作个揖就作个揖，教你滚一个就滚一个。”过去一脚，把正在检斤的10斤白面（5个人份）踢撒在站台上，混在砂子一起，不能吃了。他转身跑到站长室，兴高采烈地告诉日本站长北村舍治郎。随后，我同被踢撒白面的员工到站长室，向站长告诉监理员踢撒白面的情形时，站长说：“他是监理员，管我们的，又是日本人，能怎样。你们满洲人就是计较吃的，撒就撒了呗，少吃一点。”当时把我们推出门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下，实在有冤无处诉，员工们只好忍气吞声洒泪而退。

日本人为了保护铁路沿线畅通无阻，作侵略中国的工具，在吉林、磐石、梅河口等较大地段，均有铁道守备队和装甲车，分段担任防线。1934年至1937年，我在磐石车站工作期间，磐石县内有守备队部，在车站常备装甲车一组，命名为11号装甲车，不分昼夜经常出动巡逻线路。在1936年5月一天，沈阳吉林间501次旅客列车到站，机车上水，并交给磐石——永宁间行车路签后，突然有日本守备队士兵两名，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是通

信兵，乘这个列车去吉林送信，因为出发急迫，把重要文件忘在队部。你教这个列车开出站后，到磐石县西门外守备队部门前停下，等我们到队部取来文件上车后再开车。”我答复说：“按满铁规章，列车不准在中途随便停车，旅客列车中途停车，更是压重行车事故，不经铁路局行车司令许可，不能停车。”士兵把枪对我前胸，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不叫停车，我就打死你！”在这生死关头之际，我又说：“站长只能管站内停车，不能管中途停车。”接着士兵又说：“应当由谁来管？你告诉我。”我说：“如果强制叫中途停车，你去找机关士（开火车头的）。”于是他们跑上了机车，当列车开到守备队部门前时用枪逼着机关士，强制停车，一个人去取文件，一个人看车。等取来文件后他们才离开了机车。这次列车由于被迫中途停车，误点15分钟，机关士李右泉回吉林机务段写了晚点报告，还受到段长（日本人）的责骂，给予“记过处分”。当时中国人在工作上的这种遭遇是无处明辨的。

日本守备队靠着守备铁路的名义，可以违反铁路规章，为所欲为，铁路不敢过问。1937年2月的一天早晨，有守备队的两名士兵，拉两匹马到车站货物站台，见货物线6道停有两辆空棚车，想利用一辆运马去吉林。即擅自装车，又把梅河口——吉林间混合列车542次开到站内，找我说：“货物线有装马匹的车皮一辆，你叫这趟列车给挂上拉往吉林。”我当时想，你们擅自装车，不告诉车站请求铁路局承认，又要不请求铁路局承认，擅自挂车，车站负不起违章的责任。因为混合列车的编组，有一部分旅客车厢，由于中途站挂车，使列车晚点，影响旅客运输，按满铁规章，必须事先请求在编组站纳入编组计划，经铁路局批准才能在中途站甩、挂车。于是我答复士兵说：“混合列车，不经铁路局批准不能在中途站临时挂车。”但在到了发车时

间欲开车时，士兵用战刀架在我脖子上说：“你开车我就砍死你！”在这时我又说：“不开啦！”，随将这种情况告诉铁路局行车司令，据日本司令答复说，不准挂车，赶紧开车。我的一面告诉士兵，一面去开车。士兵又在后边置刀迫我，我看不好，又跑回办公室，不开车啦。这时铁路局行车司令又来电话问我，列车已经晚点30分钟，为什么还不开车。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况。铁路局行车司令教士兵直接用电话联系，可是士兵置之不理，就逼我给挂车，不挂车不准开车。在这时候派人去找日本站长，来给解决。可惜日本人站长不但不来，还把去找的中国人大骂一顿，在这万般无奈的时候，我又向铁路局行车司令请求，看现在的情况，马匹车不挂不行啦，列车晚点时间越拉越长，如果铁路局坚决不让挂车，我宁肯受处分，也不能冒死开车。这时列车已晚点1小时，铁路局才给了挂车命令，结果，列车因挂车晚点一个半小时才由车站出发。事后，我被迫写了事故报告，受到“记过处分”。列车出发后，日本站长来到车站，了解一下大概情况，对我说：“关东军是皇军，你不怕吗？我就怕皇军，没有皇军来东北，我能到这来当站长吗？他们叫怎么的就怎么的才行，你们满洲国人死了没有关系，我叫皇军打啦，面子不好看！”这种强辞夺理的解釋，还说我咎由自取。唉，亡国奴的滋味实在难受！

金长春为什么失踪

金 文

金长春家在柳树河子村长发电，1921年生人。全家5口人，

有父母和弟弟、妹妹。他父亲三十几岁就患了骨结核病，右手全部烂掉，左手也烂掉了拇指。因而金长春从小就挑起了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他8岁开始放马，12岁就跟大人下地干活。他个不太高，但长得结实，生就一个“车轴汉子”。一向少言寡语，很少嬉笑，大家都夸他“有大人样”。但脾气倔强，有个不服气的劲头。15岁铲地就和大人一样抱垄；16岁割小麦就拿“整刀”，还得干在前头。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马，他专治烈马，骑到马背上像粘住一样；怎样厉害的马，他也能把它驯老实了。有一次“讨伐队”闯到他们屯，抓马拉“给养”，他把东家的两匹马链上，跳上马背就跑，后面队兵紧紧追赶，并连连放枪，他毫无畏惧，打马穿山越林，到底把队兵甩掉，跑了出去。

伪康德10年，他已是23岁的大人了，娶了媳妇。那年铲完二遍地以后，他同邻近的一些青年们，到15公里以外的太平镇出劳工，干了3个多月。头两个月不断回家，以后一个多月未有回家，家里到工地去找也没有。起初以为他又到外地去了，也没有认真查找。可是一直到年末他也没有回家。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踪了。

金长春为什么失踪？家里一无所知。邻居们猜测说，可能是因为看不上媳妇出走了。看不上媳妇是确有其事，但他还不至于因此而出走。后来慢慢才打听出他所以失踪的真正原因，是被工地把头“井田”所害。

金长春出的这批劳工，是自愿的，干活挣钱。这活是在太平镇东娄家岗打石头和修筑太平镇东、西一段公路。这宗活是一个名叫井田的日本人承包的。井田原来是日本关东军的翻译。传说他是在中国的日本“料理”（妓女）生的，会说一口熟练的中国话。他那个部队伪满初期在柳树河子驻过防。后来部队开走时，他被留了下来。听说可能是因为他抽大烟，被开除了军

籍；也可能是有意派遣的什么特务。不管怎样，那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一些亡国奴眼里总是神圣的、高贵的。所以他要干的事情，总得优先、优待。他承包这工程以后，就在周围农村招募工人。有干的，须凑一二十名一伙，选出“领工”集体活动。一切事情要由“领工”和他设的“大柜”（即井田的办事处）联系，他不直接对个人办事。井田在太平镇西门里租了一个大车店做“工棚子”，工人吃住都在那里。食宿费用由工人摊纳。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附近有些青年串连起十几人，要去干活。其中就有金长春，大家选他当“领工”。经他前去联系，大家来到了井田的工棚子，干上了活。前去干活的还有外屯的若干伙，同在一起。

工程是打石头、运石头、铺路面。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活挣什么钱。挣钱不多，扣去食宿费用，拿不到几个钱。“领工”的，会来事的，还能干点好活，多挣几个；不会来事的，不但挣不到钱，就是挣下也要不出来。有些“领工”在井田面前极力溜、拍。见面很远就点头哈腰打招呼，先喊一声“伊大商”（日语井田先生），然后谄媚地表示一下他们干得如何如何好。井田说的话他们唯命是从。而金长春不行。他不卑不亢，对谁都是那副正直的面孔。见了井田，有事则谈，无事无话。金长春在那些领工的人中，是一个比较年轻精干的人，魁梧粗壮，留个小平头，两眼不大，但炯炯有神。所以开始井田对他也有些好感；虽然金长春在他面前显得有些不恭敬，但他并不觉反感；相反，见面总是井田先叫声“小金子”！可是以后有些事情，使井田越来越不如意了。比如，吃粮总是不足，“大柜”往上报人数，不但把歇工的报上，而且还额外多报。可是往下发粮按出勤人数计算。剩下粮食他们高价转卖。这样工人就得经常喝

稀粥。为抗议这种行为，金长春不等天黑就把工人领回来。说工人饿，干不动。井田听说这事很不满意。发工资，原定10天发一次，而实际有时超过十几天还不发。金长春几次催要不来，后来竟罢起工来。一天早晨运石头的汽车开到工棚门口，金长春不让工人上车，说给钱再干。司机无奈，去找井田，井田深为恼火，亲自来到工棚把金长春训斥一顿，但终于答应第二天给发工资。

这个柜头除干活的工人以外，井田还豢养一些监工的人。监工的都是穿洋服，说日本话的，但据说他们不是日本人，大家背地都叫他们“二鬼子”。这些二鬼子都是手拎根大尺棍子，这瞅瞅那看看。看哪个不顺眼，抬手就是几尺棍子，专往脑袋上打，没人敢顶。但到我们那个工段不行。他们到金长春领的工人面前挑毛病，金便立即迎上去。看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工人做错了，便主动告诉工人改正，如果工人没错，就把他们“顶”回去。有一次，日本监工小胖子（这是他的外号，井田也这么称呼他）来到我们工段，不知因为什么，伸手打一个工人。金长春看到了，便立即过去阻止，并严肃地训斥他不许打人。这小胖子也20多岁，血气方刚；而且本来就有一种占领者的优越感，他认为他打一个中国工人，不但不应该受到反抗，而且应该是俯首贴耳。现在竟有人敢对他这样不恭，他哪能忍受。便把一腔怒火泄向金长春。金长春看他打人，本来就很生气，现在他竟奔向自己来了，便和他交了手，两个撕打起来。监工的所以能随便打人，并不是因为他武艺高强，没有敌手，而都是因为被打者不敢还手。一旦遇有敢于还手的，他们就得甘拜下风。这次小胖子就没捞着便宜，被打个落花流水；被打下道旁的阳沟里，一只脚陷到了泥里，鸭舌帽也被打落地上。小胖子身边如果再有一个帮手，他们会立即把金长春捆起来打个半死。

可是在场的没人帮他，在场的全是暗中喝彩的中国劳工。无奈，小胖子只好骂了两句中国人听不懂的话，愤愤而去。

小胖子受辱的事情，当然很快就会传到井田的耳里，但井田没有来找金长春算帐。大约他是暗中“记帐”，待机报复。

有一天晚上，井田来到了工棚子。他土不土，洋不洋，上身穿一件长衫，下身穿条马裤，头戴礼帽，脚蹬一双大皮鞋。倒背双手，迈两条硕长腿，一步三晃地走了进来。这时工人正在吃晚饭。工棚子是个4间房的长筒屋子，南、北大炕，地中央放一个头号大瓷盆，盛着一盆小米粥。工人各自盛到碗里，端着坐在炕沿上吃。饭乍端进来时，有两个小伙子要闹，抢饭勺子，一下子把粥撒在了地上。井田一进屋便看到了撒在地上的稀粥。他的大长脸立即沉了下来，用恶毒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正在南、北炕上吃饭的人们，便恶狠狠地责问：“这是怎么回事？怎把饭弄一地？”这突如其来的吓唬，把大家都弄呆了。井田接着便说：“你们是吃饱了撑的，不爱吃呀！不爱吃都别吃。”说着，抬腿一脚把饭盆踢翻，一盆稀粥黄乎乎撒了一地。

这时金长春便站了起来，冲着井田说：谁弄撒的你找谁呀！你给踢翻了，别人还吃不吃？井田一看，竟又是这个一向不驯服的小金子答了话碴，他蓄积一腔子的火气，一下子全涌了上来。便抢步上前，凶狠地说：“怎么的，不服气呀，我看就是你！”说着就伸手来抓金长春的脖领子，金长春抬手把井田的胳膊拨了过去。这下子井田更火大了，咬着牙恶狠狠地说：“啊？你还动手，你还像打小胖子呢呀？！”随即便用力扑上去，两手狠狠掐住金长春的脖子，按倒在炕上，使劲地掐。在场的人多数都不敢靠前，只有几个常同井田打交道的小头头，上前去一面“伊大商、伊大商”地央求着，一面拉他掐着的双手。好半天井田才松开双手。这时金长春已被掐得脸色青紫。好一会儿才起

来。他没有屈服，两眼喷射着仇恨的火焰，久久没说一句话。但情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所以也没有立即反击。几位“好心人”一面央求，一面簇拥着把井田拉了出去。井田一面走一面回头叫喊：“小金子！不算完，哪天我再找你算帐。”金长春定神之后，指着远去的井田说：“等着吧，你不找我，我也找你。”当晚他把事情托付了别人，觉也没睡，就离开了那里。

这件事确实给大家很大震动，但大家以为中国人受侵略者的气是平常事，过些时候消消气就拉倒了，并没有做更多的推测。金长春走了之后，井田也并未来找他算帐，但有两个陌生人到工棚去询问过两次。以后当人们确认金长春已经失踪，这才纷纷做出各种猜测。凡知道上述过程的人，大部份都做着这样的猜测：一是金长春做出了报复行动，没有成功，落入虎口；一是井田看透了这个很不驯服的中国人，如不斩草除根，后必为患。所以派人暗中抓去杀害了。那时日本侵略者的杀人机关，到处皆是；杀一个反抗侵略的中国人，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井田做这种事，极其容易。

金长春失踪之后，他家失去了顶梁柱，很快就弄得家破人亡。妻子生了个孩子，由于贫困，抚养不好，死于襁褓；妻子等了两年，没有音信，也被迫改嫁；母亲眼看着儿子失踪，孙子死去，儿媳改嫁，一股火，两眼昏暗，神情恍惚，一时轻生，竟服毒而死。一家7口，走死逃亡，剩了3口，老残幼弱，甚为凄惨。

吴仁华之死

张穆安

吴仁华，原姓尹，生于朝鲜北部，于民国初入中国籍。他脱离朝鲜，正是因为“日韩合并”后，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出来。民国4年（1915年）春，吉林第一师范学院招考七、八两班，我考入八班，吴仁华入了七班，是同年级同学。这一年吉林开全省运动会，他以擅长短距离田径赛得了全场冠军的个人奖，因此在学界驰名。在读书时，正值学生抗日运动，反对“田中奏折”，抵制日货。吴仁华曾做班级代表，有所策动，屡次向同学们宣传亡国耻辱，来唤醒中国同胞。这时当局恐怕引起交涉，禁止学生活动，他虽然一时缄默，但总是别有大志，希图遇有机会，一雪国耻。民国8年（1919年），他还未毕业，五四运动发生，他倾心奔走，宣传爱国主张，得到各校学生的拥护，由师范生被推选为吉林全省的学生代表。遂赴上海，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大会。他在会上传达了吉林学界爱国运动的决心。他毕业后入了政界，曾做过吉林省会警察厅和交涉署的科员、翻译等职务，为国服务多年，贡献过一定的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感到身边有危险，便一改旧日作风，有意出入赌场，希图免祸。转年秋季他正在市内老提法司街某朝鲜人大米所，和一群朋友打牌，忽被人枪击殒命。据说凶犯也是朝鲜人，也有说是日本人冒充的。当时草草了事，案情终未大白，颇为爱国人士所痛惜。在他生前，夫妇都着中国服装，儿女数人，都读中国书，女儿尹秀芳，据说是从她外祖母的姓。

不久他爱人也在吉林死去。他的亲属来吉，接他的遗族回国时，我才知道他本姓尹。这时我和他家是近邻，两家女儿又是同学，两家交往密切。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送她们回国。

红石砬子庙惨案

耿直

庆安县东南部，有一座突兀高耸的红石砬子山，拉林清河从山脚下缓缓流过。红石砬子西侧，山环水绕，清静幽雅，在绿树掩映的半山坡上，有一座道观，当地人称为红石砬子庙。

红石砬子庙建于民国初年，前后是3栋草泥结构的房舍，前两栋是诵经礼佛的神殿，最后一栋是道人们的起居室。相传道观初建时香火很盛，每逢庙会，拈香拜佛、求签祈福的香客络绎不绝。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恣意横征暴敛，山区农民更加贫困，进庙上香的人稀少了，出外募化也很困难，就是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也是有心敬佛，无钱布施。道观内外颓垣断壁一派萧疏冷落景象。老道长张元明和他的两个徒弟李老道、孔老道师徒3人，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然而有一个从外乡来的庄稼汉，却常到庙里来，这个人叫吴相林。

原来，在这红石砬子山下拉林清河岸边，有一些朝鲜族农户种植水田，吴相林会种水稻，干活实在肯卖力气，朝鲜农户很愿雇他帮工，并亲切地称他吴三哥。吴相林工余饭后常到庙里转转，庙里的几个道士见他为人憨厚，说话爽快，眉宇间存有一团正气，言谈中流露出爱国激情，他手脚勤快，有时还帮庙里做些零活，道士们很愿意接近他，都说和他有缘份。虽然

极力表示出家人超脱凡尘，与世无争，但对吴相林讲述从外地听来的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故事，却是默默地凝神倾听着。

吴相林常来这里，一不为拜佛，二不是逛庙，他有自己不能告人的秘密。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原来吴相林是给抗联当交通，奉命在这里建立一处山上山下中转情报的地下联络站。他经过慎密的工作，已经站住了脚，并取得朝、汉两族，道、俗两家的信赖，红石砬子庙成了重要联络点，活跃在庆安县东南山区抗联战士曾多次到这里与吴相林接头，传递重要情报。

1934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庆安稻田公司的丁经理和郝都译等人挤到这里抢占耕地开发水田，在拉林清河上截流垒坝，在山脚下挖沟引水，把灌溉渠道由红石砬子延伸向徐万春屯。渠道经过之地，侵占了不少农田。由于丁、郝之流，开发水田，旨在侵吞、掠夺土地，从中渔利，哪管农田丰歉、穷人死活。对于挖沟开渠侵占或毁坏的农田，概不给任何补偿，因而引起很多农户的不满，并多次发生种地户与挖壕工激烈的争斗。对这条渠道，获益和受损的水、旱田种地户，有褒有贬，有悲有喜，从而挑起了无休止的土地争端，给历来和睦相处的朝鲜族和汉族共居的村屯，投下了相互猜忌的阴影，人为地制造了民族隔阂。虽经吴相林以及当地一些好心人斡旋、调解，但误会一时难于完全消除。

1935年雪化冰消，天气转暖。红石砬子山下又到了春播时节，家家户户在自己的田里整地播种。庄户人一年的希望都在田地里，有的全家老小都出动了，从日出忙碌到日落，才披着满身泥土，拖着疲惫的身子收工回家。吴相林和其他少有或没有土地的贫困户一样，从早到晚为别人帮工扛活。唯一例外的是，近几天来，常见一个戴眼镜的人蹲在山下河沿上，嘴里叨着烟卷，手里擎着渔竿，那副悠闲自得的神情与周围田野上挥

汗劳动的农民形成鲜明的对比。吴相林尽管对这号人从心里厌恶，但还是想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竟在这青黄不接缺粮少种的春耕大忙季节，有这等闲情逸致在河湾垂钓。

这天下午他选了一块靠近河沿的地块，一面佯装修筑水田池埂子，一面朝河沿了望，这里能看到钓鱼人背影，觉得很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城里什么地方见过。他仔细打量那个人时，忽然一阵轻风吹过，掀动起那钓鱼人的衣角，露出一件闪亮的东西。他不由心中一动，啊！那是一支挂在裤腰带上的手枪。

没有收工时吴相林一个人扛着铁锹，大步流星地向红石砬子庙方向走去。他思索着近几天这一带农民为水壕，连续发生了数起争斗的事。如果这个人再呆下去，不仅加剧民族之间的不睦，影响农户适时种地，而且不利于地下联络站的活动，他打定主意，决心约几个知己好友，搞一次铲除祸害，空手夺枪的冒险活动。

傍晚，小山村升起了袅袅炊烟，田野上干活的人已陆续还家，空荡荡的河套里，钓鱼人也在收拾渔具，准备离去。正在这时，倏地从柳条墩子后面窜出一个人，向钓鱼人直扑过去。这人正是吴相林，原来他约了两个知己，预定接近黄昏时刻，一齐下手。他绕着河套里刚刚泛绿还没有吐叶的柳条丝，悄悄接近河岸，看到钓鱼人要走，一时性急忘记了等待自己的伙伴，单人独马地冲了过去。钓鱼人躲闪不及被吴相林撞倒在河岸上，那人像一只狡猾的狐狸顺势滚下河去，一头扎进水里。钓鱼人游过河去，回头看见对岸又多了俩人，也顾不得那些渔竿渔具，犹如从猎人枪底下逃脱出来受惊的兔子，撒开腿朝昏暗的荒野里拼命狂奔而去。

吴相林和他的两个伙伴，恐出意外，没有去追赶。他们回

到红石砬子庙前，核计下一步的行动，猜测可能发生的情况。吴相林对决定这次冒险夺枪的行动感到很懊悔，由于自己太冒失而使这次行动失败，不只是放跑了一条大鱼，而更担心的是他苦心建立起的联络点能不能保全下来，他的同伴似有所悟地说道：“这个带枪到这里钓鱼的人，说不定是来搞侦察监控的敌伪特工人员。今天他跑了绝不会善罢干休，俗话说放虎归山，回头必定伤人。”为预防万一，吴相林决定到外地暂时躲几天，临行时说：“最迟在端午节返回来。”

吴相林走后的第二天，一队日本兵和王殿甲等数名警察，向红石砬子包抄过来，他们把正在山坡种地的男女老幼30余人，一齐驱赶到红石砬子庙里，其中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妇女儿童，老汪家的3个孩子，大的15岁，小的一个8岁、一个6岁。连同庙里的3个老道也被抓来。日本兵端着刺刀，在这些无辜的群众面前晃动着，先是进行威胁恫吓，要这些人说出有没有看见河边钓鱼的人？谁家和抗联有联系？有个姓吴的外地人躲到什么地方……一个日本兵走到蔡广生跟前，硬逼他承认与抗联有联系，蔡广生摇摇头刚说出不知道几个字，就被日本兵用刺刀扎进胸膛，顿时鲜血如注从刺刀口喷射出来，蔡广生倒下了，人们都吓呆了，几个孩子扑在大人怀里哭喊着。日本兵抓过一个孩子，对着众人嚎叫道：“不说出马胡子（指抗联）在哪里，统统的心坏了。”他们惨无人性杀死了孩子。然后又逐个逼问曹永山、王珍、王石头、张干巴、张元明、李老道、孔老道、陈……。问一个杀一个，最后干脆不再问话，而是像疯狂的吃人野兽又刺杀数人，然后他们把庙门顶上，放起一把大火。庙堂内的人在挣扎、惨叫、呻吟、呼喊！惨死在侵略者屠刀下的无辜民众和古老的红石砬子庙一齐在仇恨的烈火中燃烧。

农历五月初四日吴相林回来了，他带着一支抗联部队回到

红石砬山。据居住在徐万春屯的一些老年人回忆说。这支队伍是赵尚志领导的，并说赵尚志穿的衣服很破旧，脸也没洗，有人问他为什么穿这样衣服，怎么不洗脸呢？赵尚志说：“人民在苦难之中，有件衣服遮体也就不错了，日本兵还侵占着东北，赶不走敌人，哪有工夫讲究穿着，哪有脸见中国同胞。”抗联战士这次在徐万春屯，逮捕住给日本兵通风报信的人，并在红石砬子山当众处决。

抗联战士怀着满腔悲愤，就地采摘了一束散发着缕缕清香的山花，敬献在红石砬子庙的废墟上。然后默默地离开了这苦难群众用鲜血染红的红石砬子山。吴相林从此也离开这里，跟随抗联部队，投身到抗日斗争风暴中去了。

（摘自《庆安文史资料》）

龙爪惨案

焦永琦

那是1935年12月的一天，在林口县龙爪山里临时搭起的工棚里，住着200名伐木工人。这年雪很大，山里雪深没膝，工人们在大雪中伐木，有的拉锯，有的倒套子，有的归楞。工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听到山下一阵汽车响，工人们以为是鸡西方面来汽车拉木头来了，都停下来歇气。一会功夫，从山下跑上来一队日本兵，他们有的端着步枪，有的扛着机枪，个个全副武装，迅速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蒙了，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个日本军官同翻译嘀咕几句后，向工人大声喊：“马胡子（指抗联）的有？”翻译接着说：“今天

皇军来没有别的事，你们不要害怕，太君问你们见没见到抗联，说出来皇军有赏。”有的工人说：“马胡子从没来过。”“太君”说工人们说谎，又一个个追问，工人们都说没见到“马胡子”。“太君”大怒，说工人们私通抗联，良心大大地坏了。命令日军将工人们统统枪毙。“太君”一声令下，日军便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射，机枪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来回扫射，工人们刹时一批批倒下去，不一会，就全被击倒了。有几个没死过去的工人还在喘气挣扎，畜牲般的日军又端起刺刀，向正在哼哼直叫的工人刺去，一刀刺下，只听噗哧一声，随着发出一声凄厉揪心的惨叫，真是惨不忍睹。日军将我200名伐木工人全部打死后，扬长而去。有几名受重伤的工人苏醒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算是虎口余生。

这次日军制造的龙爪大屠杀惨案使当地群众十分震惊。后来人们才知道日军屠杀我伐木工人的全部真相。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鸡西梨树镇有个“汇江泉”浴池，这个浴池的经理叫叶绍卿，副经理叫吴锡九。这个吴锡九是当时驻梨树镇日本指导官尤崎的亲信、特务。因他有日本人撑腰，腰杆硬，这个浴池的实权都掌握在他手里。这年秋天，“汇江泉”浴池遭了一场大火，把浴池全部烧毁，叶绍卿和吴锡九研究要重建浴池。为了解决建浴池的木材问题，他们找到在梨树镇的木材把头王永顺，让他筹备供应木材。王永顺见这笔买卖挺有油水，便一口答应。他知道林口木材多，就来到林口龙爪沟，招雇了200名工人砍伐木材。两个多月后，王永顺回到梨树镇找吴锡九说，山里土匪多（指抗联，经常路过此地），怕出事，想不干了。吴锡九让王永顺尽快把木材伐够，早点下山。王永顺走后，吴锡九如获至宝，立即向他的主子尤崎指导官汇报，说他搞到了准确情报，抗联住在龙爪沟山上工棚。尤崎受命“剿匪”，正愁找不到抗联，听

了情报后，同吴锡九细致商榷了“讨伐”办法，便带领人马奔向龙爪沟，想把抗联一网打尽。到了龙爪工棚，不见抗联踪影，追问再三，一无所获。他怕不好交差，一怒之下，便将我200名无辜伐木工人全部打死，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工人死后，好几年时间，山上还到处可见白花花的尸骨。

忆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惨事

杨 光

1935年（伪满康德2年），我已十多岁了。那时我家住在舒兰县杨家屯（现属七里乡杨家村），亲眼目睹日军屠杀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些惨事，使我终生难忘。

枪杀大牌会

大牌会是地方各屯农民为防匪防盗而组成的一种武装组织，武器都是一种打猎用装火药的土枪。1935年深秋的一天，从平安车站来一股日本骑兵队，约100人，说是到十五方屯一带剿匪。当他们行军到十五方屯（现属七里乡）时，就通知附近各屯的大牌会，到西南岗集合。各屯大牌会以为日本皇军要训话或有其他什么活动，一个个都肩挎土枪，赶快到现场，有20人左右，排好了队。没想到日本军早已架起机枪，没等大牌会人觉醒过来，就对准大牌会开了枪，从头到尾一齐扫射。一阵枪声过后，所有的人都倒下了。在被害人中有一名叫李云汉的，见势不好，枪声一响，他就跌倒装死不动，压在死者身下。当日军走后，他爬了出来，只他一人死里逃生。临近屯的百姓，在

枪响后现场，见到一片尸体，鲜血淋淋，目不忍睹，家人邻友，哭叫连天，惨状无法形容。在这次受害人中，有个名叫蔡玉山的（家住十五方屯），当时正是20岁，被日军枪杀后，肠子都露出来了，还有气息，可是抬到家就死去了。为他送殡时，我随叔父前去看到了惨状。

威逼中国人杀中国人

1935年春耕前，由拉滨线的平安车站下来一伙日军，名叫三十八联队，强占我屯西头两个土墙大院驻防，直到冬季才撤走。在这期间，鬼子兵讨伐我们抗日军多次，亲眼看到他们多次杀人。在他们刚到我屯时，一个个像恶鬼一样，手持钢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到处乱扎乱挑，唧啦哇啦地乱叫。当时，我们对面屋的张二老头，因儿子拿土枪去河套林中打野鸡没回来，怕碰上日军给枪杀了，挂儿心切，当即惊吓而死。夏季的一天，日军讨伐到牛心顶屯（现属凤凰乡）时，在一姓孙的孤老头家，搜查到一支破手枪（是抗日队伍在他家住时落下的），当即把孙老头绑来，严刑拷打一夜。第二天又把他拉到西河套的小河边，绑在树上，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挑死。同年深秋，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汉奸报告日军，说平安村的两方三屯“通匪”，日军当即抓来该屯姓孙和姓马的两名屯长，同时还把平安村长××、自卫团长×××调来，日军向他俩说两个屯长“通匪”。第二天早晨，日军把两个屯长拉到屯西河边的黄土坑岸上，递给×××团长一支日本手枪，叫他亲自枪杀这两名屯长。团长怎能忍心杀害无辜的中国乡亲，迟迟不能开枪，然而在日军的威逼下，两名屯长终于被枪杀了。在日军撤走后，第二年春天，被害者家人挖出尸体拉回安葬。至于日军在讨伐期间和归屯并户以及清山烧村期间，杀害了多少中国人，那就无计其数了。

在日军讨伐期间，抓中国人给他们背给养的，冻死、饿死的，也不在少数。我的亲舅父张德良给他们背给养，到大山里逃跑了，才免一死。现在七里乡孙家街史国俊的叔叔就是给日军讨伐时当“小背”（背给养的），活活冻死在大山里。1987年末，我回老屯时，提起此事，有些老人还记忆犹新。

（摘自《舒兰文史资料》）

“火烧小街”始末

贾泳洋

1936年阴历五月十一，日本关东军通化守备队200余人“火烧”了通化市小庙沟里的小街（即现在的银厂村委会至老道同山下的开阔地处）及其上下十余里的居民区，枪杀平民数十人，绑架和截走了所有来不及躲避的居民和大牲畜，放火烧毁了这些居民的全部家当和田园，一手制造了通化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火烧小街”事件。

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泡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在3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在推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他们还加紧了经济侵略。日本人先后在通化的大庙沟和小庙沟分别开采了金矿和银矿。日本采矿队一行十数人，他们全面负责金矿和银矿的开采业务，这伙人都骑着自行车，戴着小礼帽，身上挎着匣子枪还有照相机、勘探仪等。

当时活动在通化地区的抗日自卫军王凤阁部的张科长支队，为了打击敌人，武装自己，按着王凤阁“决不准敌人在我抗日地区开采矿藏”的指示，准备在小庙沟的银矿附近截击日

本采矿队。农历五月初九，探兵报告，日本探矿队在大庙沟金矿活动。根据敌人采矿队一天一换地点的活动规律，敌人头天在金矿，第二天必然到银矿。张科长支队于五月初十在小庙沟银矿下的小街处埋伏。上午9时许，日本采矿队果然来了，他们一行13人，有两人坐在“二马车子”上，据说是矿长和他的儿子，其余11人都骑着自行车。由通化市内至小庙沟银矿有7.5公里路。敌人上来时，张科长他们没有下手。而在午后，张科长支队将机枪架在老道洞山下的河坝上，大车道正好经过河坝前边，这是敌人回返时的必经之路。为了防止敌人向上面的银矿（银厂第四村民组）处逃避，张科长还派人在小街的“火趟子”上用机枪火力卡住敌人上逃的道路，这样，敌人就被卡在两山间的300米的区域内。待敌人走到河坝处，两下一齐开了火，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抱头鼠窜，一些企图顽抗的敌人，早被自卫军的机枪所消灭。几个腿脚麻利的家伙窜入河边的柳毛趟子（即柳树丝），猫着腰，兔子似地往沟外（市内方向）狂奔。

战斗很快结束了，当场打死敌人9人，其中3个是日本人，跑了4人，缴获了所有的枪支、仪器和采矿图纸。

逃跑的几个敌人都受了伤，有两个被打断了膀子，在半路上包扎了伤口，继续往市里逃去。

当时居住在小街的有二十几户人家，有李家馆子、汪家床子、药房、皮铺等。这是银厂沟和赵一趟子沟的汇合处，加上老道洞山上有庙宇，每逢集日庙会，这里很热闹。枪声响起的时候，小街的居民不知其故，四处奔跑躲藏。听说是自卫军打“鬼子”，人们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大家料想敌人一定会来报复的，一些人躲到小街北边的何家沟里，一些人拾掇东西，往沟外的亲戚家跑。这天正是肖殿元家生肖文章12日，按当时的习俗，男孩12日要请乡邻吃“喜面”，肖家在头顿擀了点黑面条，

还没来得及下锅，就枪声大作。等到傍晚，一切都平息后，几个邻居才赶回来收拾东西，一家人匆匆忙忙地吃了碗半生不熟的面条，便摸黑往沟外跑。天黑路远，走到“炮台”（现肖家沟门军队俱乐部处）就走不动了，当晚就住在“炮台”下的张大扁担家里，那时候，“炮台”的常家铺子、王家磨房，全都住满了逃难的人。第二天，天还没亮，人们便在主人家吃了点儿煎饼，又匆匆赶路了。

果然不出所料，农历五月十一日上午，日本关东军的通化守备队200余人，分乘6辆大汽车，火速窜到了小街，他们见人就抓，见房就烧。老马太太准备去“炮台”常家铺子买“洋火”（火柴），刚出小街村口，碰见敌人进村抓人，她便转身往回跑，她是小脚女人，跑不动，看着敌人追近，她慌乱中躲进厕所，闪过一帮敌兵后，她又扒开篱笆，藏进自家后院的一个大木筒（这种木筒是用大圆木掏成的，像大缸口一样粗，上面有盖儿）里，躲过了敌人的魔爪。郑国凤的爷爷不肯走，结果被敌人连人带房，还有一匹骡子，一起烧死在里面。敌人从上车道岭（银厂五队与横道八队之间的地域）一直烧到下车道岭（银厂七队与横道大队之间的地域）。路上抓到两个“赶驮子”的人（当时用骡子搞贩运的人），当场打死一个人和一匹骡子。而后，敌人登上北边的老道洞，将以陈老道为首的5名老道一起抓起来，并纵火烧毁了全部庙宇。有两个老道不服，被当场打死。当天早晨，陈老道叫徒弟们赶快离开这里，他自己留下看守庙宇，徒弟们不肯，结果都被诬以“通匪罪”抓起来了。后来陈老道被枪杀在南江沿。敌人把火一直烧到“炮台”处，当时住在炮台附近的大地主“赵大金牙”领全家老小跪在路边求饶，才免毁于火，不过限他们立即搬到高丽沟门（当时归屯的地点）去住。

日本守备队把抓到的老百姓用大抱绳拴起来，十几个人一串，用汽车送往“宪兵队”，同时，也将这些居民的大牲畜都赶往“宪兵队”，余下房屋、家产、田园，一律焚烧殆尽。那时，市内还没有江桥，过江都坐艚子。有几个青年人在乘艚子过江时，跳水逃跑了。第一个跳水的是崔占田，因为他会浮水；第二个是贺大嘴（贺胜荣）的二哥，他不太会游，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在江中。

到了“宪兵队”之后，敌人让被绑群众逐个“过堂”（审问）。不知敌人从哪弄来个人头，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辨认，说认识的就是同党，一律杀掉，说不认识的就是撒谎，狠揍一顿。赵殿福当时说错了，被打死。那一次死伤很多人。后来，一些人放回来了，都被归到上围子里去居住。

事后不久，日本人为在小街打死的3个日本人修了一个石碑，位置在小街下的河边上（现在部队弹药库对面的河滩上），石碑有七八尺高，上面刻有死者的简历。年深日久，大河涨水时冲倒了。1958年，石匠“大老孙”将那个石碑制成两盘磨，给老李家一盘，给张家满家一盘，后来，邻居们都说石碑做磨不吉利，又都扔了。

劫击日本采矿队的张科长支队是小庙沟一带的抗日自卫军，统归王凤阁管辖，这个支队大约有20个人，有机枪、有土炮，更多的是杂七杂八的武器。他们既打日本，也打“土匪”，同时还注意宣传和鼓动群众。那时在老道洞的山上，不管是大树上，还是大石头上，都刻着“打倒小日本、保家卫国”之类的标语口号。上山打柴的人都能看到。当时在银矿上面的老道沟一带有一伙“胡子”四处绑票，为首的叫王参谋（王子龙），这伙人是老土匪“九江龙”（真名于海楼）的残部，他们四下绑票，什么坏事都干，有钱没钱都绑，后来被张科长给消灭了。于

海楼被打垮后去了集安某矿山当工头儿，解放后，被当地群众揪出打死了。张科长支队除了打仗之外，也向村里百姓收税。后来，听说张科长那帮人儿在北边被日本人抓住了，转过年的秋天，在二道砬豁沟门被鬼子枪毙了。

枪毙张科长那天，上围子出10个人去挖坑。当时人们不知道挖坑干什么用，都说“自己挖坑埋自己”，所以去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土坑挖了1米深，傍晚时，市里来一辆汽车，挖坑的人被赶到高粱垛子后边躲起来，不许走动不许声张。人们只见从汽车上跳下一些日本人和伪军，又从车上推下一些五花大绑的中国人，这一次一共枪毙了11个人，其中有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据说是张科长和他的家属以及部下。银厂七队的衣风山的二兄弟就是这次毙的，那时他才投奔张科长一个多月。

注 张科长，一说为王凤阁部张荣久连长。张荣久曾于1934年烧毁大庙沟金矿，缴获枪支、测量仪、照相机等武器、物品，向王凤阁报捷。此说有待考证。

火烧小街亲历人简况

1. 贾姜氏（已故）笔者祖母，当时家住小街。
2. 徐忠林（现在银厂二队）笔者岳父，84岁，当年家住花甸子。
3. 郑国风（现在银厂二队）笔者邻居，62岁，当年家住小街。
4. 肖桂兰（现在银厂围子）笔者邻居，65岁，肖文章亲姐姐，家住小街。
5. 何胜金（现银厂六队）小街遗址处，72岁，家住小街。
6. 李树清（现银厂围子）66岁，当时家住高丽沟子。
7. 杨传林（现银厂二队）69岁，当时家住花甸子。

8. 李生福（现银厂七队）79岁，当时家住何家沟。
 9. 苏德山（现银厂一队）82岁，土改至四清时村长。
 10. 胡振江（现银厂二队）86岁，土改时中共党员。
 11. 王殿臣（现银厂围子）82岁，当时家住高丽沟子。
 12. 徐忠才（现银厂围子）65岁，当年家住花甸子。
 13. 艾景云（现银厂围子）65岁，当年家住花甸子。
- 以上诸人归屯后都归到银厂围子，1987年调查。

火烧小营子与汉奸恶棍董青山

胡笑天

火烧小营子

小营子是延吉市东郊十里外三面环山的村庄。住户并不多，稀拉拉的一些住户，最多不过十几家。1932年，这个地方进行三七和四六分批庄稼。但分批得比任何地方都紧张，都杂乱，好坏人不分，这主要的是日本人腿子、特务，从中作祟，挑拨是非，陷害平民。因之，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恨。小营子北山，近磨盘山的地方，有当地群众斗争6名腿子、特务。结果，6名腿子、特务被群众打死，挖坑埋上。后来，腿子、特务的家人为了报复，到日本宪兵队报告说：“小营子地方有独立军，有共产党。崔某（朝鲜族，名不详）是独立军头子。”于是日本人派来大批军队，拉着大炮和机关枪，来到小营子地方。首先把崔某住宅放火烧着。邻居几家也被烧光。同时，小营子的人，被抓了不少，也跑了不少。被抓的地主李某被说成是独立军的人，当

场枪决，扔在水井里。又把街里带来的钟向阳（汉族），说成共产党，也当场枪决，悬头示众。同时，在北山上架大炮往南山上轰击，整整轰了一天。有的人说，这是敲山震虎，威吓人们。大炮不断地轰着，同时，又在小营子进行大搜查。凡是被抓的人，都说成是独立军或共产党。用铁丝穿在手上，把人们成串地押回街里。

汉奸恶棍董青山

董青山是龙井镇土豪劣绅韩回子栽培起来的地痞恶棍。韩回子当海源长烧锅经理的时候，董青山是这个烧锅跑外购的。韩回子当龙井镇商务会长时候，董青山是这个商务会的办事员。伪满时期，韩回子当上了龙井镇日满协和会会长，董青山当上了奉公队长。从此，这个地痞恶棍董青山，身穿黄色日满协和服，头戴协和帽，脚穿高腰黑皮靴，腰持战刀，狐假虎威起来。干起了伤天害理的勾当来。

奉公队长，实际就是勤劳奉仕队长。主要的任务是抓劳工。董青山这个坏蛋抓劳工，比日本宪兵和警察还毒辣。一般老百姓看见董青山比看见宪兵队和警察还要害怕。别人抓不着的劳工，他手到擒来。只要定名抓你，你就别想逃脱。白天抓不着，黑天抓。尤其是抓汉族人（所谓满人）。可是有钱的人，花上几个钱，就不抓。有势的人，不但不抓，反而特别奉迎。他专能收拾贫穷困难的人。这些人们犯在他手里就没好。凡是被抓的人，身强壮的送到矿山去劳动，身体较弱的人，下操受训。操练的时候，这个恶棍董青山真比日本人还凶狠，操练不好，轻则挨骂，其实他不懂日语，却一口一个“叭嘎”。不仅如此，还要罚站、罚跪，重则拳打脚踢、蹲黑屋子，真把人弄得叫苦连天，敢怒而不敢言。有的身体衰弱，支持不了，因之得病身亡。

有的被逼无奈，抛妻离子，自行寻死。送矿山劳动而被累死的，更不知道多少。

1947年，砍挖运动的时候，这个地痞恶棍董青山在龙井公园被斗。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斗争会后被当场执行枪决。同时，在他家起出了大量搜刮来的民财。如洋车3辆、留声机1台、照像机两架、手表怀表7块、洋白面19袋、粳米11袋、白兰地酒5瓶、金银首饰、皮鞋、布料……应有尽有。大量的现金，统计不下万元。

学生时期的回忆

于国新

炸竹竿堵高丽

1931年9月下旬的一些日子里，寇半沟的老百姓纷纷议论，大伙儿都要准备竹竿削上尖，用豆油炸好，到海边去堵高丽，别让他们从海边上岸来。这是官儿的命令。过了些日子，没有看到谁炸竹竿，我们这些小学生都迷惑不解。后来，从老师嘴里才知道，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老师们说：“我们都将成为风前烛了！”他们不便于说当亡国奴，只说有这么一课书——《最后一课》^①，老师意味深长地把课文读了两遍：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今天是你最后一堂法

^① 《最后一课》，为法国小说家都德作。二战时期，法国战败，割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两州给德国。

语课，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听了以后，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小学生都心领神会了。翌年，日本守备队侵入我县，大肆烧杀。从此，庄河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庄河大地燃起了抗日烽火。

压杠子的人

我读完了小学四年，通过考试，在第五区寇半沟念上高级小学（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第五区，有现在乡镇三个这么大的范围。当时的高级小学，每年只招收50人。一个这么大的行政区，高级小学在校生才100人左右，绝大部分在校食宿。三面环山一边临河的学校环境，确是风景宜人，学校的西邻是警察所，从我们的宿舍里可以看到穿灰色警装的人，对捉来的那些人，压着杠子要他们承认什么，“犯人”叫苦连天地惨叫声，令人心酸。因为和他们是邻院，课余时间遇到警察就问：被你们压杠子的人，那样叫屈不认，若是弄错了怎么办？他们说：你们这些小家伙，“错捉不能错放嘛”。是的，那时节，错捉是不能错放的，谁能奈何！

英那河畔的忠魂

1932年农历三月初的一天，我的家乡双塔岭东北侧楸树沟，发生了一场抗日救国军和日军、伪军的战斗。那天午饭刚过，我看到五个骑马的军人，扛着黄地大旗顺河东沿向北飞跑。同时，在我家东山一个大石骨子附近（石缝后山），有数不清的军人在那里匆匆忙忙地做一些什么活动。当寇半沟南山（双塔岭）枪炮声大作以后不久，我家周围，从东山相继飞来三发炮弹，一颗落在院里，炸死了两条狗，炸伤了一匹马。所幸，家人无一伤亡。一群伪军冲进我家，衣物等被洗劫一空。事后才

知道，日寇从西南面双塔岭，伪军大同队从东北、东南面包围了抗日救国军几支不是统一归属的队伍。他们用抬杆、火药枪、来复枪打死了十五六名日军。日军为寻找一名失踪的同伙，当天灯火时分才从双塔岭前八家子屯仓惶而去。我们的抗日救国军被伪军大同队活捉了一批人。翌日，于寇半沟，由当地百姓保释出来一部分，老百姓还要力争多保释一些抗日救国军，无奈，伪军不许保释了。遂于寇半沟高级小学操场上，一次集体枪杀了70余人。事后，当地百姓用两捆高粱秸夹着一具尸体，移送到英那河畔下店屯西大湾子掩埋了。

挂人头的城门

1934年，我就读于庄河中学。那时节，我县的抗日救国军，主要是在北部山区和丘陵地带进行抗击敌人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弄得鬼子和伪警察“讨伐队”蒙头转向，因而恼羞成怒，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报复。割下抗日救国军的人头装在小木箱里，挂在庄河上街的北门上，或装在大簸箩里，放在城门旁，最多一次竟有七八个人头放在簸箩里。过往行人目睹这一惨状，面面相觑，悄然离去。除庄河街外，青堆子街北头小土丘上的几根桩子上，也常挂着抗日军的人头“示众”。有一年寒假时，我路经青堆子回家途中，看到一位为当地人们所熟悉的杨国×头被挂在桩子上了，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日、伪军妄图以血腥屠杀的手段“以儆效尤”。事实上，直到1937年，抗日救国军化整为零前，从未停止过对敌人的斗争。当时我县各支归属不同的抗日队伍，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联合起来进行持久的斗争。于是，他们中有的奔向北边外，有的回家务农。我屯有一位宗姓的抗日军大刀会成员，曾在庄河、岫岩、凤城等地多次抗击过日、伪军。在伪满统治时期，谁也没有告举他是大刀会成员。亡

了国，当了奴隶的人们，民族意识是泯灭不了的。“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这支歌子，长久地铭记在人们的心里，现在有些70岁上下的人，有的还能背诵下来这首歌词。

坑儒·焚书

1937年元旦，庄河县城发生了不祥事件。元旦前夕，驻在庄河日本领事馆以宴请方式扣留了原庄河两级中学校长宋良忱，并施以残酷的刑罚。紧接着1月3日逮捕了新婚刚三天的庄河两级中学教务主任戚景龙，又逮捕了教学有方、受到全校学生赞佩的数学老师张彦果。此外，庄河女师校长林贵家、小学校长孙孝先也先后被捕。一时间，校内外的气氛十分紧张。日本领事馆的便衣特务，穿着中国式的对襟马褂，手持小皮包，出入校内外，监视着学校正门出入的人们。学校的后门，除挑水时间外，牢固地上了锁。风传什么捉了教师再捉学生。于是学校上下，人人自危，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遭灭顶之灾。师生间、同学间相视虽无言，但心照不宣。被日本领事馆捉去的教育界知名人士，于1937年春，宋良忱校长等被处决于浑河边，戚、张二位老师被判徒刑坐牢。其他人等，或处死或判刑。1937年3月间，在庄河南门上张贴了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签署的布告，振振有词地对宋良忱等人加上了“大逆不道”的“反满抗日”的罪名。真是强盗有理，爱国获罪，暗无天日。事后才知道安东（现丹东）、通化一带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一批爱国的知识界名流，被日帝杀害了。

庄河两级中学发生不祥事件时，我是学校图书管理员，课余时间负责借阅书刊工作。当时的风言风语，使我这个管理图书的拿不定主意，也知道有些藏书查阅起来是不能允许保留的。在不能请示主管图书石老师的情况下，把一些图书从书架上取下

来，事先约好了挑水夫大老孔，待半夜后做早饭时，当烧柴，付之一炬，免得学校受什么刁难，翌日，去庄河下街南头永源书局，买了一些日文书籍摆放在书架上。知道这事的只有几个炊事员和挑水夫大老孔，谁也没泄密。想起来，要负“焚书”的罪名了。更多的书是焚在庄河两级中学宿舍院内天后宫的大鼎里，视书如命的学生，忍痛把心爱的书，投进火堆里。日帝在我县坑儒又焚书，要从思想、文化上窒息我们。殊不知，烧了书是烧不掉民族意识的。事实上，直到“九·三”光复，东北大地人民，从未停止以各种形式对日、伪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我就学于吉林高师时，知道这么一桩事：伪国军在敦化一带进山“围剿”抗日游击队。在雪深没膝的严冬里，游击队兜着圈子把他们引进了长达几百里的深山密林里，那些由中国人、朝鲜人（包括朝鲜妇女）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弄得他们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出来。最后，被拖得精疲力尽，好不容易从密林中逃了出来。为此，日本皇军十分恼火，大发雷霆，责骂了一通。但他们总算得以活命。

灯火管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又是《泰东日报》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北平附近的宛平县城一日军失踪，从而成为事变的起因。“九·一八”事变后，人们传说，是中国人炸了柳条沟铁道。那时，是真是假谁知道！反正是几千名关东军坐在遮着窗帘的军车里，从大连到沈阳昼夜不停地南来北往，佯装增兵，既而一夜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而这次卢沟桥事变一爆发，日军竟在庄河这样偏僻的地方，搞起防空灯火管制！他们为什么这样胆战心虚？当时庄河街不间断地搞灯火管制演习，以防“敌机”空袭。每天从掌灯时分起，手播式警报器一响，中学的

学生就成了“传令兵”，串大街，走小巷，声嘶力竭地大呼大喊：闭灯！把窗帘挡好，不准漏光！闹得人心惶惶，不知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灯火管制的“了望台”设在“义合成”商号的二楼平台上。这里安放了空袭警报器，有日、伪军政人员去指挥。后来，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寇侵占，直至发生了“八·一三”事变，庄河的灯火管制才停下来。其后，从报纸上看到：“太阳旗”今天插到中国这座城市，明天即插到那个城镇，直至插到南京城头上，以此来宣扬日本帝国的“国威”，妄图从心理上征服我们。我在吉林读书时，星期天，游吉林江东龙潭名胜，当时正从那里往小丰满水电站修筑铁路。修路的劳工是从河北押运来的宋哲元二十九军××团的士兵，他们在卢沟桥一带首先抗日，由于得不到支援，打了败仗，成了俘虏而心里不服。领着修铁道的是他们的团长。他们的处境极为凄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境不堪想象。工地附近是高山丛林，设有刺网和暗哨，逃也逃不了。他们是被俘的中国军人，我们是学生，见了面敢说些实话，都是中国人嘛，总是有民族意识的。“七·七”事变发生之时，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覆亡之始。中国人民没有被征服，被压迫的中国各族人民，终于赶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

（摘自《庄河文史资料》）

“亚细亚号”特快列车

苏崇民

说起满铁的旅客运输，几乎所有的满铁社员都要夸耀“亚细亚”号特快。这是战前日本人以自己的技术行驶的亚洲豪华

型特快列车，是满铁的骄傲。该车是由机车和了望一等车、二等车各一节、三等车两节加上餐车、行李车所组成，总定员为328人。机车是天蓝色，客车是浓绿色，车体中央画白带，车的整体是流线型。机车“啪西那”（太平洋）型全重200吨，备有自动投煤装置，动轮直径为2米。客车的座位是电钮自动式，备有美制空调装置。“亚细亚”号的倡议者是运转方面的实际业务人员。决定制造“亚细亚”号特快是1933年8月13日的满铁理事会的。“亚细亚”号的全部客车车厢和机车“啪西那”号12辆中的3辆是满铁沙河口工厂制造的，其余9辆机车是川崎车辆厂制造的。“亚细亚”号从1934年9月1日开始，在大连和长春间704公里的铁路上运转，营业限制速度定为120公里，是当时世界最快列车之一。停车站只有大石桥、鞍山、奉天、四平，行车时间为8小时20分，平均时速为82.5公里。1935年9月1日又延长到哈尔滨，行车时间12时30分。由于“亚细亚”号体现了满铁技术的最高水平，甚至有人认为“战后日本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也是以亚细亚号为基础”。所以，战后原满铁社员仍津津乐道，召开回忆集会，出版回忆文集，制作亚细亚号模型。“亚细亚”号在当时对欧美的宣传上也起了很大作用。“亚细亚”号对于在时间上缩短日本统治东北的两个中心城市大连和长春之间的距离起了重要作用。不过，我们应当指出当时这个跑在东北大地上的豪华列车与中国人民大众是无缘的。它只是欧美游客和日本侵略者的旅行工具。中国人中除极少数汉奸外很少有人乘坐“亚细亚”号，且不说它的警戒森严，它的高额票价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1941年7月，日本实行“关特演”时，“亚细亚”号被停运，1941年末恢复，1943年3月1日，随战局的演变，大连港的衰落，“亚细亚”号终于在满铁线上消失。

黑山县临时“国势调查”纪略

郝让先

1940年10月1日，伪满全国有所谓临时国势调查之实施。彼时笔者正滥竽为伪黑山县公署行政科国兵民籍股，且又亲主其事，故能略记如下情况：

一、“国势调查”的缘起

伪满洲国的临时国势调查，是依日本帝国国大正年间和昭和年间两次施行的日本国势调查事仿而来。也是日寇在满握有军政大权的关东军司令官同在伪国务院说一不二的日寇派遣军高级行政长官，双方协议要彻底了解当时的伪国形势，以便加紧严密地搜刮满洲物资和奴役中国东北人民，就假手傀儡皇帝的圣意，下颁命令伪国务院民生部取法日本的国势调查实施方案和做法，策划出来伪满洲国的临时国势调查纲要和注意事项并实施办法等，下达各省民生厅，依次又下达到各市县旗而具体实施。

二、作用

敌伪当局所以要实行临时国势调查的真实目的，概要分析就不外下列十二项：

（一）伪满全国人口真实总数。

（二）伪满全国人口中男多少、女多少、青壮年多少、合于服劳役年龄者有多少，以及军、警、政、学、工、农、商、医、

各行各业的和无业的地痞流氓到底有多少？

(三) 了解技术人才和开汽车、开火车、操纵工矿机械……以及一般木工、瓦工、铁工……的实际数目。

(四) 实际掌握各省市县的人力形势，而为其后侵略战争的动员上有所准备。

(五) 给各市县旗的街村公所打下户籍原簿的根基。

(六) 给日寇和伪满的军、宪、警、特或司法机关在监视所谓满人的不法和进行反满抗日的行动上创造有利条件。

(七) 彻底清出黑人黑户、以免再有不法分子潜藏街里和穷乡僻壤间进行活动或破坏。

(八) 防止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和抗日地下工作者进行活动。

(九) 为实行十家连坐及伪自卫团的保甲法提供方便的依据。

(十) 为实行国兵法及勤劳俸仕并劳工法提供确切的数字基础。

(十一) 为经济统制、粮棉出荷、物资配给，以及征用各种应战用品并清查政治犯、思想犯、要视察人等提供准确的证据。

(十二) 为其后制发国民手帐（形同良民证）做准备。

三、实施前的准备

首先由伪国务院民生部印制临时国势调查纲要和调查时注意事项约万余本，还有必须每户一张的临时国势调查表约六七百万份。连同百户一张的统计表以及国势调查员的任命状等，真是偌大的一批印刷材料。当即依据以前由市县报到省署、由省署报到伪中央的初步户数复返分配给各省市县间。其次即分别由各省公署民生厅召集属下各县派遣讲习员到省参加临时国势

讲习会。当时黑山是属锦州省管，黑山县长接到通知，由庶务科长岸田和副县长千原岩商讨结果，就派遣我及庶务股长刘广田（子耕、会日本语）、警务科宁警尉补三人参加这个会。我们三人遵期到省报到，季节约是8月末，讲习会地址为锦州省伪省公署楼上大礼堂（我记得那时省署是在铁道北边配水池南）。参加讲习的学员12个县和锦州市的以及工矿、车站、旅馆、戏院……各机关部门共约百多人。主持讲习会的为省署民生厅地方科长（原在黑山当过半年时间的副县长，对中国古文很有理解和研究）。会期三日，第一日会程为地方科长报告临时国势调查的“伟大意义”和当前实施的必要性。总括如下：

（一）将全国人口清出实际总数，并了解到某地方稠密、某地方稀疏，密者土地不足用，疏者旷土很多，就这人口疏密的不同和旷土多或土地不足用的关系上，实有因机因地而互相调剂之意义（其实是日寇欲扩展开拓团，实行其移民政策而已）。

（二）有清出黑人黑户而立即编上户口，是对国家治安有所保障，是对人民安居乐业上有所裨益之意义（其实是杜绝红军和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的潜入匿居）。

（三）有助于征兵实施和劳工取调以及征用各行各业（指木工、瓦工、铁工、缝纫工……）的人力动员上的意义。

第一日下午和第二日全日，均由省方主管临时国势调查事务者，主讲临时国势调查纲要及注意事项并实施做法等。事前每人都发纲要手册一本、调查表一份、统计表一份，当即开讲如何填写的具体要求。

讲习会第三日上午是全体讲习员填表练习时间，由主管人在大黑板上设例，大家即握笔依据听得的规矩填写，当场交卷。最后提出优劣两种典型，不提填表人姓名地讲出填得对否，作为全体讲习员的楷模和借鉴。同日下午领取国势调查纲要和手

册等，每县约百份上下。我们黑山也和别市县旗一样地做好手续，共领下纲要120册，国势调查表75000张并统计表等且立即包装妥当由火车运寄黑山。下午3时省署邀请全体讲习员到锦州市满洲饭店举行宴会，饭后又到省署领取国势调查员任命状。任命状印刷得很堂皇精美。内容是：兹任命锦州省××市（县、旗）××街（村）×××为满洲帝国临时国势调查员之职。任务重要，特颁此状。下署锦州省长姜恩之，伪康德年月日，且盖有官印。于此可见敌伪非常重视国势调查一事了。

四、从市县到街村的具体实施情形

笔者和刘宁二人由省回县之后，当即向县长、副县长、庶务科长汇报情形，同时所拟具的街村临时国势调查讲习会计划及调查时的具体做法亦得到批准执行。首先是分区召开调查员讲习会。全县由我们三人分担。第一区域为黑山（包括黑山街、十里村、胡家村、拉拉屯村、八道砬村、白厂门村、太和村、营坊村等），由笔者担任讲师并组织之，且代表县长转发省长给的国势调查员任命状。

第二区域为大虎山（包括大虎山村、七台村、段家村、高山子村、励家村、大兴村、姜屯村、绕阳河村、半拉门村、曹岗村等），宁警尉补担任讲师，其他任务同前。

第三区域为新立屯（新立屯街、罗屯村、无梁殿村、二道境村、长岭村、英城村、朝北营村、大黑山村、芳山镇村等），由刘广田担任讲师，其他任务亦同前。约莫是9月中旬我们三个人都携带临时国势调查纲要和国势调查员的空白任命状以及调查表统计表等，分别出发到达任务地。有的用两个村合并开一个讲习会，有的一个村就开一个讲习会。指定的参加人员是：街村长、助理员、其他有关国兵民籍的街村吏员、当地警察分所

长、协和分会长、学校校长、教师、区屯长、自卫团长、牌组长、街村区域内的车站长、工厂长、矿山长、旅店和戏院经理以及有声望的士绅富户等（就是没有基层村民，在当时社会，无论是何种事情都是敌寇、官、绅、警、甲、土豪等勾结在一起的，基层的贫苦百姓只是被剥削、被奴役、被支配宰割而已）。我们到达街村后，第一步是选定临时国势调查员（莫如说是街村长和警察分所长等给指定的人员），选定后即由街村吏员在任命状空白处楷书某某姓名，一一整理完好，则更以隆重的仪式由我们做讲师的代表县长转发给堂乎其皇的省长颁给的任命状。

第二步是每一街村配发三本或四本临时国势调查纲要、注意事项。并给与会人员每人一份临时国势调查表。（一）如有工厂、矿山、车站、汽车、公司、旅店、娱乐场所等负责人参加时，则给与临时国势调查表。（二）街村国兵民籍责任者及区屯长除前表外且给与调查统计表甲、乙、丙三种。于是即开始讲习。先传达伪中央和伪省署的指示，次即本着纲要、条条解释，再次就说明调查表和统计表的实际使用法。

第三步是指定10月1日正午（零时为临时国势调查的正式填表时间）是全国一致的行动，是各地一致的行动。丝毫不容马虎或有所迟早。尤其表上的“在”和“不在”最为要紧。至其表中繁琐细节或发现黑人黑户……等的如何措施，均如省方指示的讲给大家，不再细表。

第四步是当场亦实行填表练习，错者纠正，对者作为典型示范，练习后且互相传阅借鉴。

第五步是同街村长、警察分所长、协和分会长、区屯长等当面划定主副村的调查区。每50户为一区，由一名国势调查员担任，且做出实施计划及担当的调查人员名表，更须编好被调

查户的户头统计表。

第六步是要求民籍责任者按甲、乙、丙三种统计表将户数、人口数（分别男女，城市工、商、市民、农户也要有分别）、职业分类、宗教分宗派，年龄分19岁以前，19岁到35岁，36岁到55岁，55岁以下者，也分别统计清楚。

第七步是要求民籍责任者将统计表留底稿后报县。至各户的临时国势调查表也按户号顺序编排后装订成册，前附户头目录，即留村保管做为各街村民籍簿之原本。

第八步是街村长于10月1日后即须按照满洲帝国的街村民籍法行使掌管民籍之职权。

最后且交付调查时使用之临时国势调查表及统计表等。我们三人就这样把黑山县29个街村的临时国势调查的具体实施的准备工作指导完了。我们当时很清楚伪满全国其他各省、市、县、旗、街、村间也都正在如此进行着。时为9月中旬，下旬即为各调查员到户下作准备调查之记载并将繁多的各项预先填写完竣。等10月1日午间零时一到，当即一下成功了。

下边写出调查表的择要和统计表形式，但事隔20余年，单凭回忆是不免挂一漏万的。

甲、临时国势调查表中每户不可缺的必要调查项目是：

1. 户主及户员的姓名、别名、与户主关系、年龄、出生年月日、性别、种族、信仰的宗教等。
2. 户主及户员的职业别（要区分出军、政、警、法、医、学、工、农、商或家事无业等）。
3. 户主及户员的技工或特长（要分木工、瓦工、铁工、缝纫工、被服工、建筑工、油漆工、驾驶机械开汽车、火车、轮船……等）。
4. 户主及户员的读书年限和最终的毕业学校。

5. 户主及户员的工作年限、受何奖赏或惩罚。

6. 户主及户员的原籍和现住所。

7. 户主及户员在10月1日午间零时在家与否，均以消除线的填划与否为表示。其“不在”者要问明所往之地址而附记于现住所下方。

8. 户主及户员的面貌或身形的特征（如瘸、瞎、拐脚、罗锅、歪脖、缺耳、六指、缺唇、花纹皮肤、黑记……等）

9. 户主和同居人的关系（其同居人的调查亦如前）。

10. 户主和雇佣人的关系（其雇佣人的调查亦如前）表末要统计每户的全人口、男口、女口、合计，合国兵年龄者几名，合服劳役年龄者几名、学生几名、无业者几名、技术工几名等。

乙、临时国势调查的统计表形式是：

黑山县黑山街中心区临时国势调查统计表（一）

户号	户主姓名	男口	女口	十九岁以前		十九岁—三十五岁			三十五—五十五岁			五十五岁以后		技术工	附记
				儿童	学生	学有	有	家	有	家	有	家	有		
						生	业	业	事	业	业	事			
计	户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此外尚有统计表（二）（三）因繁琐不赘述了。

五、临时国势调查的正式实施

1940年10月1日前夕，笔者同刘宁二人又分头领导黑山街

内各区的国势调查员进行布置工作。且将国兵民籍股的郑翻译、刘崑江事务员、何景春事务员、川野伊佐美股长、庶务股的胡治元等又分别到新立屯街、无梁殿村、八道砬村、大虎山村、姜屯村去监督实行临时国势调查。10月1日午间零时到了，黑山街是以鸣汽笛为开始时间，有的外村用敲钟或吹号方法，有的即看钟表时间到了就开始。当即一齐动手、调查填表。真是火车上有调查员、汽车上有调查员、旅店有调查员、戏院有调查员、工厂矿工有调查员、学校监狱有调查员、闾里街衙乡村僻镇都有调查员……调查员到处在进行着调查任务。对于“在”和“不在”都做得一清如水，且无一漏掉者。个别地方且清出一些黑人和黑户而给重新编制户籍。

六、调查结果和群众对它的评价

10月10日前我县各街村的（一）（二）（三）各号统计表便如雪片般飞来，完全由笔者一手整理汇总，何景春事务员仅为我打打算盘而已。汇总结果，如今但凭回忆记得黑山县全境户口是7万余户，人口为38万多（29街村合计数目）。关于国势调查材料我已散得无片纸只字。但对当时黑山街黑山县城户口还记忆得比较清楚些是：3657户（内有商户333家），其中男口为10425人，女口为8844人，合计为19269人。但全满百多个市县旗的人口总数因伪国报纸未掲載故而无从知晓。但经过此次调查整理和街村民籍法的同时实施后，确给街村民籍掌握上打下基础，便于查选适龄国兵了，便于征用劳动力或技工了，便于防奸防盗了，便于搜刮物资了，便于防止红军或抗日地下工作者的潜入了，总之是便于日寇统治满洲和奴役中国东北人民了。然而事实竟有和上記相反者，由于地主豪绅和贪官的勾结，由于街村长分所长等的贪污成性，篡改民籍者有之，用坏水消

除了国兵适龄的生年月日者又有之，偷梁换柱折页行私者更有之。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故基层的贫苦群众对当时国势调查的评价是：这次调查结果正是为衙村长、衙村吏员们辟出一条新的贪污受贿发小财的途径；正是为地主豪绅警察们造成了和衙村吏员狼狈为奸的好机会。其后出国兵的多是贫雇农和穷苦人们，出劳工、出木工、瓦工的多是贫雇农和穷苦人们。出各种物资，如要麻袋、要鸡蛋、要萝卜干等，也多是贫雇农和穷苦人们。因为富人可以用金钱贿改或用势力强迫涂消原籍上的记载。最终仍是出现了黑人黑户，倘或有一人要隐匿起来，尤其是贫苦的同阶级的人们都是互相关怀设法给遮掩过去。这样不但鬼子找不着，就是伪警察宪特衙村长屯区长的汉奸们也是捉摸不得的。

伪满临时国势调查的概况

王社厚

“国势调查”始于西欧国家，它是一种观察人类和社会共同生活现象的方法。它具有广狭二义，在广义方面是调查人口及其他经济上社会上一般事实，在狭意方面则以调查人口为主要目标。实施国势调查的国家，为了便于统计调查本国人口静态情况，以本国为一单位，选择一定时日，在该时日内正确把握本国人口的动态。实施国势调查的国家，均在其国家法律上规定着每隔若干年实施一次，但伪政府是迎合它实际的需要，并没有既定伪法的规定，仅突然地实施临时国势调查，使群众不得窥其底蕴，也正显示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欲为的表现。

日寇侵略东北后，几年来除不遗余力地着手残酷性的政治及掠夺性的经济外，为了所谓国防的巩固，必须对我东北同胞动态要严密掌握，以便对将来统治方面奠定基础，因此决定在伪满实施临时国势调查。临时国势调查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被侵略国家中人及物的资源调查。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其法律上最初规定在明治38年实施第一次国势调查，但实际在其国内并未施行，相反的对当时被侵略的我国台湾境内实施，这次在伪满实施的国势调查与上情况并无不同之处。它的主要目标，除狭义方面以调查伪国内人中动态为口实外，其广义方面主要是以调查境内人口纳税思想以及为国防、司法、及财政提供必要的条件。

日寇决定临时国势调查实施后，当由伪国务院公布，其主要意义：“我满洲国建国以来，在产业上及文化上具有长足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巩固国基，加强各方建设，特决定实施临时国势调查，国内居民不分国籍及种族之分，所有在住者，均应按规定内容，进行申报，如有隐瞒虚报情节，一经发觉，当严惩”。该公布正意味着所有东北人民应毫无遗漏地真实地进行申报。

1940年10月1日是伪国实施国势调查的开始日，在实施调查前正值我在伪吉林省公署地方科工作，也正是同该调查有过联系，当时临时国势调查工作由伪国务院内务局掌管，后又由该局暂设满洲国临时国势调查事务局来作该项工作。在伪满各省分署对该项事务由各地地方科执掌，至检各市、县、旗则分别由各地地方公署行政科，其最基层则由街、村分别执行办理。

在国势调查实施前无论在伪中央、省、县以及街、村均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以期该项工作彻底进行，因此在该年6月初国务院内务局先函达伪满各省公署，除将临时国势调查宗旨

提示外，并令各省指派二人或三人赴伪国都新京参加该项工作讲习会，讲习日期以二日为限，地址在该市红卍字会礼堂内。

日寇为了搞好伪满临时国势调查事务，特由其国内请一名在日本曾于1919年实施首次国势调查的熟手担任该项指导工作。在伪新京临时国势调查讲习会中，当时伪满各省公署参加人员约50余人，且两日里由其负责人详加指示，会后并印发临时国势调查各表格及为何填写方法的小册子，除调查填写日遵于指定日时记载外，对于调查完毕表格之统计编纂亦得按其指示分别提交各级政府，因事关紧急重大，不得迟延贻误。伪中央召开该项会议后，吉林省公署为了加紧措施，曾在省境内指定三个地区同样召开国势调查讲习会，指定各市县旗抽调二名或三名参加讲习，当时分东、西、中三部地区、东部地区在舒兰县公署，参加县份有舒兰县、蛟河县、桦甸县、磐石县、西部地区在长春县公署，参加县份有长春县、德惠县、扶余县、伊通县、双阳县、乾安县、农安县、郭尔罗斯前旗、怀德县等。中部地区在吉林市伪省公署召开，参加的有吉林市、永吉县、九台等市县。对参加县份的讲习，由伪省公署各派二人担任，同时由伪中央印制国势调查表格按各市、县、旗人口之多寡，分别发给与会者，经过两天的讲习和讨论才算结束。惟该工作实际应由最基层地方行政机构的街、村执行，因此在各市、县、旗公署亦遵伪省公署之指示，遵期召开各街、村讲习会。对于临时国势调查工作的渗透，是按此逐步深入，以期达成日寇的要求。

日寇对于临时国势调查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尤其在填写方面恐怕被调查者及填写人不认真具实申告填写，而且实际着手该项工作又由基层单位办理。在伪满统治下的广大农村文盲居多，自己不能填写，即便有填写的能力，而伪政府又不相信，因

此各市、县、旗公署除动员日系职员做为监督外，更动员所有所谓满系职员及学校中满系教职员参加填写表格工作。

该调查时日是在1940年10月1日零时，被调查范围是凡在零时当时伪国境内的居民以及在零时所生的婴儿亦包括在内，相反的在零时有死亡者即不应填写。除一般居民由各街、村负责调查填写外，至于在零时时内无论是水路或陆路间旅行者，亦不得漏报，如在客轮应由船长负调查责任，在火车上则由列车长负责调查填写，如此秘密调查工作，凡在伪国内的人民无论在原地或赴其他地区旅行，均不能脱掉临时国势调查。

在伪满临时国势调查表格内，

一般被调查者，应申报填写事项如下：

一、姓名 二、性别 三、年龄 四、籍贯 五、现住所
六、配偶关系 七、职业 八、地位（指在家庭中占有的地位）
九、出生地 十、国籍 十一、教育程度 十二、神族
十三、动产（包括现金、股票、债券、机械、牲畜、车辆等）
十四、不动产（包括土地、房屋等） 十五、伪满年月日，
十六、兵役关系等的表示。根据该表格，为上所述，应逐一具实申告填写。

在当年9月1日全满一致开始临时国势调查。该调查完了后，各街、村又大行整理，同一表格分为两份，一份保存于当地行政主管单位外，另一份表格交由主管市、县、旗报请省署，经伪国务院拨由伪司法部归案。

该调查完竣后，当于翌年公布全满各省市县旗人口统计数字，伪政府却用该数字隐蔽临时国势调查的主要目的。但实际上目标总不外加强伪国防建设，无论在兵役上或一般服役上势必以该调查做随时应用之资料。其它对于土地、牲畜的征用以及对伪税的赋课上，亦由该调查资料发挥一种无比强大的作用。

伪满临时国势调查记

谷春圃

1940年（伪康德7年），伪国务院应关东军第三课意见，要明了全“满洲国”户口正确数目，伪院郑重其事地去调查统计，特于伪院组设“临时国事调查局”，大事铺张，听说拨临时调查费100万元，分配各伪省、市局内，当时由伪院总务厅的地方处、统计处、弘报处、治安部的警务司配合。从4月到6月对全境有关人员实施训练指导。

关于调查区域明白指定，以吉林、滨江、龙江、三江、黑河、东安、牡丹江、通化、四平、四平等14个伪省区，另外有新京和哈尔滨两“特别市”、“特别区”，还包括海拉尔、满洲里、博克图，富拉尔基、横道河子、绥芬河等地白俄地区，还有伪兴安区四省东内蒙古地带。

参加调查的人由负责的伪官吏至街道居民组长，尚有地方临时邀集的人员，非常广泛，一个地方分若干调查区，调查员即负责某个区的调查，不得稍有隐瞒遗漏。居民由7月开始按调查表式样详细填写，不准污损改抹。凡新生小儿，家庭来客，亲属同居以及亲族同居和分居，个人出生年月日、岁数、职业、迁来年月日（由何地因何原因迁来）必须和原“户口调书”（户口簿）所载相符，不准稍有错误，照表式填写完毕，对照“户口调书”无误以后，交由居民组长加盖验讫章，向本号调查区调查员报告后，再向上申告。仅就这一场填表申告，使老百姓不明真相，恐惶惊疑，尤其乡间的村屯长，借事生非，从中收

益，虽属个别地区和个别人恶习作风，但老百姓受了一场惊扰。

由7月到9月各调查区调查申告“书类”等整理，以9月30日子夜，为全满洲国国势调查终结时间，由10月1日发给各居民各户“临时国势调查申告完讫证”。调查结果计人口男子1900万，女子1700万，共计人口3600万。

伪国势调查完了，伪国务院总务厅内的伪临时国势调查局为了纪念此事，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印制了若干国势调查纪念奖状，特由东京铸造紫铜质、挂红白缎绶的纪念章，直径约五公分，表面铸伪国务院楼房，底面为“康德七年国势调查纪念章”字样。这些章、状分别奖给各省市参加国势调查有功人员佩带。新京特别市印发给各户“临时国势调查申告完讫证”。当时限定此证虽已调查终了，但必须留意保管，有时要进行查看。

伪满施行“民籍法”的见闻

赵卜谦

伪满时人人担惊的“暂行民籍法”是1940年公布的。表面文章是说：为了明了国民的范围和身份的关系，树立民籍制度。它的骨子里是想把“黑户”、“黑人”一网打尽的方法之一。

所谓“黑户”、“黑人”是指未被伪政府所掌握的、从北而来的归国侨民和从南而来出山海关谋生者。省、市、县、旗的人口都有显著地增加。在伪满建国时号称“人民三千万”（见伪满国歌），1940年的“国势调查”已达4300余万（伪国势调查局发表）。在这里边难保没有所谓“反满抗日”和“国际间谍等分子”混迹其间，意图是把他们彻底地消灭掉。

因此，为了解每个人的来历，就在“暂行民籍法”里规定：“凡填小孩、认领私生子、过房儿子、结婚、离婚、死亡、失踪、入籍、离籍的时候，户长要向市、街、村长或保长，努图克达（蒙古的基层组织）警察署长、国境警察队长报告，方准落籍为民”。但是，无民籍的人，回避向法院请求许可的规定，于是在当时的社会里，就出现了两种很奇怪的现象。一种是：无民籍的人恐怕盘根问底，露出马脚来，不得不辗转请托介绍认识到一个有民籍的户，现金交易，使它诡称为同乡的关系或亲戚的关系，向有关方面报告入籍同居，其实是同桌吃饭、各自分炊。无民籍的人如果没有现金，必须取具妥保，每月分工资的半数以酬落籍同居的户主。使某些有民籍的人，增加了不劳而获的收入。另一种是：警察每接到一件请求“入籍、离籍、分户、转籍”等类的报告，必百般地刁难，多次调查，满足欲壑，才给许可，凭空地给他们开辟了一个赃款的来源。

伪政府也感觉到自上而下的法律力量，从纵面入手是不够的，同年又公布了“国民邻保组织要纲”，兼从横面入手，企图达到预期的目的。

同时，国际形势也有了变化，伪满对于苏联付清了收买北铁的欠款后趁势提出设立伪满与苏联“国境界限”、“防止纠纷”两个委员会的建议，在哈尔滨开会，未能达成协议，汪伪政权宣言“还都南京”取消了伪华北的临时政府，对于华北劳动者的统治也松了劲。因而伪满采取对从南从北入境的劳动者，更进一步实施了“劳动票检印”的办法，来加强防止“黑户”、“黑人”的潜入。